

主管单位：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
主办单位：陕西社会主义学院

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SHAANXI INSTITUTE OF SOCIALISM



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主管单位：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
主办单位：陕西社会主义学院
编辑出版：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编辑部
编辑部地址：西安市长安南路 84 号
出版日期：2025 年 4 月
电 话：(029) 83690153
邮 编：710061
电子邮箱：sxsyxb@126.com

2025 年 4 月 10 日出版

目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三重思维视域下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用”关系论	韩春阳 陈政君 (5)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重要论述探析	张嘉瑶 (11)

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

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激励机制研究	吴 双 (15)
以统一战线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伟力	赵晓娥 张雪梅 (21)
关于构建科学化党外代表人士工作体系的思考	雷 波 (27)

期刊基本参数：

CN61-1321/D * 1992 * A4 * 64 * zh * P * ¥7.50 * 2000 * 13 * 2025-02

参政党的建设

参政党提高调查研究能力的目标与路径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重要论述精神

..... 王 凯 (32)

当前形势下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汪 锐 (37)

中华文化研究

在坚持“两个结合”中传承发扬照金精神 李 倩 (44)

“讲信修睦”的历史意蕴与当代价值 陈祎舒 (49)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建构探析 张进蒙 闫海红 (54)

观察与思考

红色体育的传承、发展及其当代价值 张 珂 (60)

声 明

本刊已加入《中国期刊网》《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等，凡是在本刊发表的文章都将自动进入以上电子出版物，本刊所付稿酬已包含各种电子出版物及网上服务的报酬，不另计酬。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来稿时向本刊声明，本刊将作适当处理。

本刊顾问

崔 歆 周 静 袁炜伟 朱 丽

编辑委员会

袁炜伟 燕连福 苏玉波 陈晓莉
何 诚 张 涛 尹夏清 王西军
张 玮

主 编：袁炜伟

执行主编：张 玮

编辑部主任：王目星

责 任 编 辑：蒙晓哲 王目星
王晚璿 黄晓翠
唐 倩 马文婷
李 蕾 张嘉瑶
温 晔 刘 悦
樊 苏

三重思维视域下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用”关系论

韩春阳¹ 陈政君²

(1. 陕西氢能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陕西 西安 710000; 2. 海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海南 海口 570228)

摘要: 习近平文化思想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创新突破, 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路径作出了全局部署, 具有“明体达用, 体用贯通”的理论品格并为文化建设实践提供了根本遵循。以历史性思维明晰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用”关系的内涵与来源, 以辩证性思维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所体现的“明体达用”, 以系统性思维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体用贯通”, 有助于学习并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特征, 体会其主体与客体、认识论与方法论、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关系, 明确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路径图与任务书, 从而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文化繁荣,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关键词: 习近平文化思想 “体用”关系 历史思维 辩证思维 系统思维

中图分类号: G1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218 (2025) 02-00-0

2023年10月, 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该思想充分彰显了“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理论品格与根本遵循, 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也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和真理精髓。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阐明了新的文化生命体及其文化使命。这一新的文化生命体之“体”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魂”是马克思主义; “根”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文化使命在于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把握新的文化使命, 要求以新的文化生命体来树立思想和文化的主体性, 掌握文化领导权。

一、历史性思维: 明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用”之渊源

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用”关系广博精深, 其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 发展于当下现实境遇, 并指导着未来文化发展的路径。因此, 需以历史思维揭示其内涵与来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历史是一面镜子, 从历史中, 我们能够更好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 历史也是一位智者, 同历史对话, 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1] 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历史中继承、总结、创新而来, 既蕴含着浓厚的历史情怀, 又彰显深邃的历史观照。考察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用”渊源, 要通过历史

收稿日期: 2025-01-15

作者简介: 韩春阳, 女, 陕西氢能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职员,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哲学硕士, 英国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汉学院儒学经典研究专业硕士, 研究方向: 先秦儒家哲学; 陈政君, 女, 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

思维,充分认识到这一思想经过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500年社会主义运动史以及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史的丰厚滋养,它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文明理论,实现了主体与客体、认识论与方法论、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具备“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理论品格,是一套系统性文化思想。

(一) 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用”内涵

“体用”是中国古典哲学中的一对基本范畴。在“体-用”关系中,“体”是基础和根本,“用”是作用与效用;“用”以“体”为本,并发展运用“体”。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宋明理学家最善言体用,尤其是朱熹,体用几乎贯穿其思想始终。朱子曾言:“见在底便是体,后来生底便是用。”北宋思想家胡瑗正式提出了“明体达用”的思想。近代,体用观念被用于处理中西思想、制度等的关系上,“中体西用”一时成为主流观念。及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体用关系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用论。

其一,习近平运用历史思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阐释了文化体用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中,马克思主义是“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根脉”,而中国实际则构成了理论创新的前提。因此,“魂脉”“根脉”与“中国实际”都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之体的重要来源与组成部分,亦构成了“两个结合”的重要规律:“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第一个结合”是“第二个结合”的重要前提,因为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我们的文

化才能根魂同体,明体达用。同时,“第二个结合”不仅丰富和发展了“第一个结合”的内涵,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还增强了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习近平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2]因此,我们应深刻认识“两个结合”的重要意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结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助力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激荡中坚定自信、稳步前行,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迈进。

其二,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框架中,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用”关系以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为核心内容展开。生产力、生产技术属于“用”的范畴,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是“体”的组成部分。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了新的文化生命体,即“体”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魂”是马克思主义,“根”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根魂同体,结合中国具体实际、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借鉴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为用的“体用”关系中,要明确两个地位:第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它不仅是文化“体用”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控制着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居于枢纽地位的生产关系领域,并对另外两个领域中结合中国具体实际、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借鉴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进行辐射影响。习近平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制高点。”^[3]第二,结合中国具体实际、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较于借鉴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在“用”中占据主体地位,因为它们发挥重大作用的领域是更为能动的上层建筑,涉及“制度”与“文化”;而借鉴西方资本

主义文明要素，主要涉及生产领域中的生产技术成果，处于“器物”层面，所以，要把握好主次关系，处理好主次矛盾。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用”来源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智慧结晶，所以要论其体用来源，就要从历史中探寻。习近平关于以中华文明为基点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之问、时代之问振聋发聩：“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4]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5]“根脉”与“魂脉”共同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之“体”的来源。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从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出发，系统阐述了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政党的关系，回答了文化的内涵、哲学基础、政治立场、价值目标等一系列理论问题，以深邃的理论思考和宏阔的文化视野，揭示了人类社会变革中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不同维度，反映出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忠实继承与创新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 5000 多年的绵延发展中，积淀了人类社会恒久需要的人文精神，如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豁达胸襟，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美学追求，以及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的道德理念等。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同样蕴含着独有的文化理念。这些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髓，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理论品格等相融互通，诠释出中华文明“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的探索精神，充盈着浓郁的中国味和深厚的中华情。正是马克

思主义这个“魂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相结合而发生的“化学反应”，使得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主体性得以巩固彰显。

深入探究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用”的历史渊源，我们发现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紧密相连。马克思曾明确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5]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内在联系，也为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用”提供了关键线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历史与时代的交汇点上，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深刻把握时代脉搏。在世界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背景下，党中央深入思考并精心谋划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推动新时代文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具体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实践中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一方面，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巩固了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广泛传播，文明新风得到弘扬，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力量日益壮大。此外，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不断提升，主流思想舆论巩固壮大；文艺事业蓬勃发展，一大批优秀作品竞相涌现；中华文化影响力持续扩大，国家文化软实力不断提高。

这些成就充分证明，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在理论上阐明了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怎么看”，更在实践层面回答了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怎么干”。它是认识论与方法论、真理性和价值性的高度统一，为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事业繁荣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这一思想体系在历史的长河中汲取智慧，在时代的浪潮中彰显力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二、辩证性思维：辨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之特征

运用辩证思维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明体达用”，明确习近平文化思想“体”与“用”之间的普遍联系、整体贯通、相互支撑与运动变化，是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要求。

（一）“明体”中“根脉”与“魂脉”的辩证统一

“明体”是为了实现“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其具体展现在诸多方面。例如，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提出了“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并强调“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发生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又如，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了文化建设的基本遵循原则：“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文化自信强调立足文化主体性、原创性，不断增强文化发展的内驱动力，在构建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思想文化进程中，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开放包容强调着眼于文化开放性、吸纳性，不断提升对外学习借鉴能力，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吸收有益成果，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守正创新强调文化连续性、创新性，不断加大返本开新的力度，在继承与发展辩证统一的思想文化进程中，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

实现新的思想解放需要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不忘初心才能勇担使命。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力量之源，中国共产党人所取得的伟大历史成就，也正是马克思主义最伟大、最生动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并阐述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深刻阐明并诠释了社会意识

形态生成和展开的一般路径，深入追溯并勾勒了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基本历史线索。其内在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开放性，使之成为站在历史进步一边的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精神武器。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在理论创新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实践融贯中促进文化融通、在历史变迁中实现文化变革，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神基脉。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进而推动“第二个结合”，实现又一次思想解放，是培元固本、培根铸魂的应时之需与应需之要。

实现新的思想解放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传承弘扬。习近平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传承弘扬，同样是贯穿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一条重要线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赓续中华文明，持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而实现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全局性、根本性转变，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成提供了现实土壤。要言之，在对文明要素的立破并举之中凸显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资源整合与价值牵引，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突出特点。

在理论内涵上，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所取得的文化成果、文化成就、工作经验进行的科学凝练总结，具有启迪当下、面向未来的精神感召力、理念号召力和价值指引力，为实现“第二个结合”又一次思想解放开辟了坦途。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培根铸魂，对马克思主义魂脉始终坚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传承弘扬，要求于新时代新征程努力实现“第二个结合”新的思想解放，体现了“根”与“魂”的辩证统一。

（二）“达用”中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

“达用”，是为了规定“文化工作布局上的

部署要求”，明确“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即这一思想“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

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体”与“用”相统一的辩证逻辑，开启了照亮历史的古今思想对话。它在理论创新与实践革新中，又一次照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未来道路，实现了自我构建与自我主张的统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深刻把握新时代历史方位，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宏阔的历史视野、深远的战略考量，就文化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具有理论引领力、实践指导力、文明号召力的完整思想体系。质言之，习近平文化思想之所以是视野宏阔、内涵丰富的科学思想，之所以是体系完整、导向鲜明的科学理论，之所以是“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科学体系，就在于其以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和奋斗力量激发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强大势能，就在于其以中国哲学思想智慧观照当代文化发展的现实情境，就在于其以思想、科学理论之“体”深刻揭示新时代新征程上的文化使命之“用”。以上多个方面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相互成就，共同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在结构。

三、系统性思维：析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用贯通”之特征

运用系统思维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用贯通”是深入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用贯通”实现了体与用、理论与实践、认识论与方法论的辩证统一。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整体性布局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系统性，主要体现在其整体性布局上。任何有效的科学制度，一定要完备、稳定、协调、公开。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其

内在层次。“理论武装：聚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是首要政治任务，作为最高层次的核心要素辐射一切、影响其他层次。其他层次包含十要素：七个“着力”，一个“充分激发”，两个“不断”。即“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充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7]。十要素彼此之间，及其和“理论武装”这一核心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协同，内在统一于党的二十大精神，统一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于党的十八大以来宣传思想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并将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逐渐展开为越来越丰富的科学思想体系。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整体系统，并非“体”之主旨和“用”之效用的简单并列。更重要的是，“体”“用”二者存在相互贯通的内在联系与矛盾运动。王阳明所言“即体而言用在体，即用而言体在用，是谓体用一源”，正是体用贯通的体现。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具有创新性和突破性的文化理论观点，与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实践举措相互贯通、内在联系。“体”决定“用”，“用”体现并发展“体”。例如，“第二个结合”的理论观点必然决定了“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一文化建设的实践路径，而后者也集中体现并反映了“第二个结合”的思想真谛。又如，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认识上，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

族的文化主体性,这一认识论必然决定了“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这一方法论;反之,方法论也蕴含着这一认识论。再比如,习近平文化思想揭示了文明交流互鉴规律,在实践上的要求便是“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二)“七个着力点”整体性推进

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这一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七个着力”的要求,呈现一个系统性的内在结构,有总有分,内外相系,上下贯通,既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又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通过系统布局 and 深远谋划,“七个着力”成为指导新时代文化建设实现新气象新作为的行动纲领。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不断展开的、开放式的思想体系,必将随着实践深入不断丰富发展。当前,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我国社会思想领域也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这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这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提出了新挑战、新要求。要将海纳百川的包容气度和守正创新的开拓思维结合起来,坚持和运用好“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生动实践中继续推进理论创新,熔铸古今、汇通中外,打造契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概念、新论断、新表述。要聚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这个首要政治任务,在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阐释上持续发力,把拓宽基础理论研究视域同加强正面宣传工作统一起来,既讲清楚蕴藏其中的深刻道理、学理和哲理,又切实增强党员、干部和群众对这一思想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要围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使命,精准锚定“七个着力”战略重点,并

将其同习近平围绕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出的“九个坚持”“十四个强调”等要求融通起来,加强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研究、阐释,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强大真理伟力更充分地展现出来。

习近平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8]我们要运用系统思维,在坚持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体达用、以用明体“体用贯通”的前提下,统筹兼顾文化理论创新与实践建设,紧抓“七个着力点”,运用“六个坚持”方法论,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篇带动全局,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担负起新时代文化使命,为建设文化强国、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 [2] 余俊生. 高质高效传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N]. 人民日报, 2023-11-01 (09).
- [3] 习近平. 更好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 [J]. 求是, 2022 (13): 4-19.
- [4]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4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2.
- [5] 习近平.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J]. 求是, 2023 (20): 4-9.
- [6]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11.
- [7] 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 [N]. 人民日报, 2023-10-09 (01).
- [8]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J]. 求是, 2023 (17): 4-17.

责任编辑: 龚 苏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重要论述探析

张嘉瑶

(陕西社会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1)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立足新时代新要求,从党和国家现实发展的实际需求出发,就继承和发扬调查研究这一优良传统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梳理分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重要论述的理论渊源、文化根基、实践总结,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增强对调查研究的科学认识。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调查研究 思想探析

中图分类号: D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218 (2025) 02-000-0

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优良传统,是应对风高浪急现实挑战强有力的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调查研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结晶的汲取,同时也是对他个人实践工作的经验总结。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重要论述的理论渊源

(一)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理论渊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是在前人思想基础上的赓续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对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通过实际调查,收集一手资料,从中分析并获得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本质规律的正确认

识,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保障。1843年马克思在担任《莱茵报》主编时发表了《摩泽尔记者的辩护》的文章,对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居民生活状况进行深入调研并收集了大量资料,以详尽的事实揭露了官僚主义的现实问题,是马克思关于调查研究的开篇之作。在创作《资本论》的过程中,马克思更是认真做好调查研究,深入工厂、农村等地,大量阅读各种文献资料,“阅读了2000多册有关经济学著作,收集了4000多种报刊杂志,研究了大量的英国官方会议的有关文件和蓝皮书。他写的各种摘录、手稿、提纲、札记等达100多本”^[1]。1880年马克思设计了《工人调查表》,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共包括99条内容,详细调查了工人们的基本工作及防护赔偿情况,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工资、生活开支、产品价格变动,工会、罢工、反对资本家的斗争等情况,整个调查表通俗易懂、分门别类、具体细致,还注意询问有关童工、女工的工作时间及

收稿日期: 2025-01-15

作者简介: 张嘉瑶,女,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中共党史、统一战线理论。

与他们在同样时间内的工资状况,详细了解各种生活必须项目的价格等等,全面调查了解当时法国工人阶级实际工作和生活状况。恩格斯通过考察访问矿山、工人家庭以及伦敦、利物浦等工业中心,收集整理大量一手资料,详细了解并分析了英国工人的工作状况、工作及生活条件、工资收入、开展斗争等情况,最终形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用事实揭露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并进行强烈控诉。

(二) 列宁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

列宁同样注重发挥调查研究的重要作用。如在创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时,他对收集到的大量统计资料进行经济学上的研究和批判性的审查,分析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俄国社会经济制度及阶级结构。1918年,针对当时在报纸报道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如就宣传内容、不同事情的篇幅设置上的不合理,列宁提出了具体要求,其中关于经济问题,更是明确指出“我们需要的经济是指搜集、周密地审核和研究新生活的实际建设中的各种事实……是否真有成绩?有哪些成绩?证实了没有?其中有没有虚构、夸大和书生式的许诺?成绩是怎样取得的?怎样扩大的?”^[2]从具体的问题出发了解详细情况,从而摆脱空泛的议论。在苏维埃俄国国民经济恢复并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始逐步探索的新时期,列宁也充分发挥了调查研究的强有力作用。当时苏维埃俄国国内经济状况依旧十分严峻,工人、农民生活得不到应有保障,余粮征集制遭到抵制,一些地方甚至出现暴动。面对这一现实问题,列宁深入考察并总结经验教训,全面分析了国内战争时期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实施的经济举措,结合新形势下的发展要求,及时调整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发展商品经济。

(三) 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

回顾党的历史可以发现,调查研究始终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积

累了丰富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优良传统。

1927年初,毛泽东实地考察了五个县的农民运动,组织召开调查会并听取报告,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30年5月为进一步了解富农问题和商业状况,毛泽东开展了一次最大规模的调查,即寻乌调查,接触了包括教师、农民、学生、秀才、商人、工人、干部等不同身份的对象,此次调查后写下了《调查工作》(后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明确指出“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3]。改革开放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进一步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系统、全面的调查研究。中央多次派出代表团出访他国,解放思想、拓展视野,学习借鉴、引进国外先进技术,邓小平要求出访考察要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一些问题。他也亲自前往日本、新加坡等国进行访问和考察,学习社会管理的经验、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引进利用外资的经验等等。江泽民多次强调开展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指出“坚持调查研究,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要求,是党保持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重要渠道,也是我们党的一个基本工作方法和领导制度”^[4]。2000年2月他在广东考察时首次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也是多次赴基层调研,2005年他在十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讲到“调查研究是我们的谋事之基、成事之道”^[5],指出要着重加强对社会结构发展变化、社会利益关系发展变化、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调查研究。

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重要论述的文化之根

(一)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调查研究思想

《大学》有云“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主张穷究事物原理,从而获得知识。《论语·八佾》中“子入太庙,每事问”,记载了博学多识且注重礼仪的孔子,到太庙每件事情都要问一问,后来指遇事多向人请教,多做调

查研究。“每事问”不仅体现了孔子作为圣人所具备的谦虚好学的美德,也体现为一种科学有效的学习方法。《庄子·天下》中“以参为验”,《楚辞·惜往日》中“弗参验以考实”,都强调要通过综合比较来做验证,来考察事实真相。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的思想,这里的“知”主要是指人的道德意识观念,“行”即人的道德践履。毛泽东则进一步发展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行观,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知行合一”,指出要“坚持知行合一、真抓实干,做实干家”^[6]。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时引用了南宋理学家张栻《论语解·序》中的“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这句话阐释了“知”与“行”相互促进、相互作用的关系,即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知识就会不断增长,认识也会更加精进,而认识的深化又会让实践行动更有方向感。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思想,主张的是做学问要有益于国家,要能够治理世事,强调关注社会现实,求真务实,以天下为己任。

由此可以看出,我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思想内核。

(二) 中国古代开展社会调查的经验智慧

我国自原始社会起就已有对自然万物或是民间民情的社会调查。《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的如“数法日月星辰”“日中,星鸟,以殷中春”“日短,星昴,以正中冬”,就是根据日月星辰的变化制定历法,观察太阳运行规律,测定日出日落的时刻,确认节气。再如“明通四方耳目”,就是指让四方言路畅通,了解沟通四方的情况。《史记·夏本纪》中记载大禹治理水土时的做法:“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通过实地勘察立木做标记,测定高山大河,随身携带测定平直的绳索、圆规和方矩,测定时令的仪器,用来开辟土地,打通道路,修筑堤坝,测量山岳。《管子·问》中有云:“凡

立朝廷,问有本纪。”即凡操持朝政,询问调查有一定的规律,并且提出要考察各项事务,包括百姓生活、官吏、军器情况等覆盖经济、社会、政治、军事等多项内容。《淮南子》中更是有载“禹之时以五音听治,悬钟鼓磬铎,置鞀以待四方之士。为号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谕寡人以义者击钟,告寡人以事者振铎,语寡人以忧者击磬,有狱讼者摇鞀’”,专门悬挂钟鼓磬铎接待四方人士,凭借这五音来处理政务。古时更有“采风”制度,设有专门的采诗官,向民间广泛采诗以观风俗、知民情,调查为政得失情况。正如《礼记》有载:“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命市纳贾,以观民之所好恶,志淫好辟。”可以看到,天子定期要巡视天下,到民间调研,通过所采集的诗歌民谣来观察民俗风情,通过掌管市场买卖的官吏汇报物价来观察老百姓的喜好,了解所喜好的是否偏邪不正,这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调查活动。

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重要论述的实践总结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也源于他长期实践的经验总结。

在梁家河时,习近平曾两次前往四川考察学习办沼气、利用沼气的经验,“在40多的时间里,考察组一口气跑了四川绵阳、广元等5个地区17个县”^[7],还抓住一切机会了解社情民意。在正定工作期间,他深入社会调查,不打招呼,直接下乡、下厂、入户,发放调查问卷,“习近平带着县委的干部、工作人员,特别选在正定县城大集的时候,在大街上摆上桌子,来赶集的老百姓一从我们这里经过,我们就主动递给他们纸条,纸条上的内容就是调查问卷”^[8]。在厦门工作时,习近平更是一上任就带队赴同安县展开调研。在宁德工作时,一到任他就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开展考察调研,走访企业、农户,了解生产生活情况,“陪着习书记一个县一个县地跑,把宁德下辖9个县市全部跑遍了,之后又到温州考察”^[9]。号召大家到基层去寻找思路、寻

找答案,总结提出要有“滴水穿石”的精神,树立“弱鸟先飞”的意识;还积极推动“四下基层”,真正深入群众、贴近群众、服务群众,为群众办实事。在福州时,习近平立足当地,着眼未来,提出发展海洋经济,亲自去印度尼西亚考察了解情况,推动渔民走出国门,开展合作捕捞。同时,在他的领导下,通过万人问卷、千人调研、百人论证,历时半年最终形成了《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从1999年至2002年在福建省政府主持工作期间,习近平也是经常开展调研工作,直面群众关心的难点、焦点、痛点问题,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呼声,坚持先调研后决策,一切从实际出发。“仅2002年6月,他就有13天时间在基层调研……2000年上半年,习近平同志作了密集的专题调研。他两赴泉州,还去了福州、厦门等地……2000年7月,在前期调研基础上,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全省经济结构调整工作会议。他指出,福建经济结构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着力‘调快、调大、调高、调新、调优、调活’,提高全省经济综合竞争力。这‘六个调整’,为当时和之后全省的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10]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用9个月时间就跑了全省90个县市区当中的69个”^[11],立足实际、深入调研,在调研中了解情况,分析挖掘优势力量,形成了“八八战略”,推动“山海协作”。2005年结合《建设文化大省纲要》的实施情况,他主持了省委关于文化大省建设的调研课题,将近一年的时间深入省、市、县三级开展全面系统的调研。也是这一年在浙江安吉县余村调研时,正式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更是身先士卒,扎实推进做好调查研究工作。2013年他在湖南湘西十八洞村考察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先后7次主持召开中央扶贫工作座谈会,50多次调研扶贫工作,走遍了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在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时,他前往吉林、安徽、湖

南、广东等多地进行考察,亲自主持召开多场座谈会,邀请多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基层代表进行座谈,广泛听取意见建议。为了做好党的二十大报告起草工作,习近平在报告起草伊始就明确强调:“在起草工作中要充分发扬民主,加强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集中起各方面智慧。”^[12]

可以看出,习近平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工作,身体力行、求真务实,为全党做好调查研究工作树立了典范,并且通过实际调研深入思考、总结经验、把握规律,深刻阐释了有关调查研究的一系列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

【参考文献】

- [1] 鲁从明. “资本论”的思想精华和伟大生命力: 修订本 [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6.
- [2] 列宁. 列宁选集: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572.
-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8.
- [4] 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 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306.
- [5] 胡锦涛. 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69.
- [6]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在常学常新中加强理论修养 在知行合一中主动担当作为 [N]. 人民日报, 2019-03-02 (01).
- [7] 梁家河编写组. 梁家河 [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8: 102.
- [8] “习总书记三十多年前就做好以身许国的思想准备了”: 习近平在正定 [N]. 学习时报, 2018-02-26 (03).
- [9] “我与习总书记交接在基层”(上): 习近平在宁德(一) [N]. 学习时报, 2019-05-20 (03).
- [10] “习近平同志不仅重视调研、躬行调研, 而且讲究科学调研、高效调研”: 习近平在福建(十七) [N]. 学习时报, 2020-07-24 (03).
- [11] “习总书记的‘八八战略’是在调研中逐渐形成并不断完善的”: 习近平在浙江(十四) [N]. 学习时报, 2021-03-19 (03).
- [12] 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党的二十大报告诞生记 [EB/OL]. (2022-10-26).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cpc20/2022-10/26/c_1129079968.htm.

责任编辑: 蒙晓哲

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激励机制研究

吴 双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上海 201620)

摘 要:当前,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管理机制存在包括参与渠道有限、数字化程度不足、管理和服

关键词:高校统战 党外知识分子 建言献策 激励机制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218 (2025) 02-00-0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要“更好发挥党外人士作用,健全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制度”,“完善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引领机制”。在当今日益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下,高质量的决策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和维护公共利益至关重要。党外知识分子作为高校中的重要群体,不仅在学术研究上扮演着核心角色,而且在政策制定和社会治理中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1]。据统计,目前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已超过2.4亿人,其中党外知识分子1.8亿人,约占75%^[2]。高校党外知识分子通过专业知识和独立思考,能够对政策制定提出富有深度的见解和建设性的意见,从而促进决策的科学化。与此同时,建言献策也是提升高校治理水平、培养创新人才的关键途径。根据《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和中央关于加强党外

知识分子工作有关文件精神,高校应当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鼓励党外知识分子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

在新的历史时期,高校统战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 and 机遇。为推进新时代的统战工作,展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与强大生命力,有必要深入探讨如何借助数字统战等手段构建有效的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激励机制,从而优化政策制定、推进学术发展和社会进步。

一、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参与建言献策的现状分析

从调研数据来看,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的建言献策机制正逐步得到完善,并已开始发挥积极作用,这些进展充分体现了在促进党外知识分子参

收稿日期: 2025-01-15

基金项目: 2024年度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系统统一战线调查研究项目(JWTZDY-2024-B4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吴双,男,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法学。

与学校和社会治理方面所取得的显著成效。当前所取得的成绩不仅反映了机制的有效性,也彰显了党外知识分子在促进高校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 建言献策的渠道逐渐畅通

为了拓宽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的渠道,各大高校采取了多种措施,建立了多样化的参与平台,例如党外人士之家、建言献策基地、决策咨询直报站等多种形式,使党外知识分子能够方便快捷地提交他们的建议和反馈,确保意见和建议能够有效地被收集和采纳^{[3][4]}。据统计,某大学通过其在线平台每年收集的建议量超过 1000 条,极大地促进了信息的交流和反馈。

(二) 交流学习的机会有所增加

高校之间的交流合作频繁,为党外知识分子提供了更多跨学科和跨领域研讨的机会^[5]。高校经常举办学术论坛,为党外知识分子提供展示研究成果、分享观点和经验的平台。通过举办专题工作坊和研讨会,许多高校为党外知识分子提供了深入探讨特定议题的空间,有助于促进跨学科合作,激发新的思想火花^[6]。多样化的参与平台不仅丰富了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的方式,而且确保了他们的观点能够被及时收悉和得到重视。

(三) 党外知识分子参与度与影响力稳步提升

在高校中,党外知识分子定期参与建言献策机制的比例有所提高^[7]。统计数据显示,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参与建言献策的热情和积极性高涨,提案数量和获采纳数量均呈现出增长趋势。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2022 年全区党外知识分子通过各类渠道提交的建言献策数量比上年增长 80%,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被采纳、批示的成果较上一年增长 45%^[8]。在高校治理结构中,党外知识分子的代表比例也在上升,一些决策委员会中非党员知识分子的比例达到 20%—30%。这些数据表明,党外知识分子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提升^[9]。

(四) 建言献策激励与反馈机制进一步优化

为了进一步激发党外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高校不断优化建言献策的激励与反馈机制。一些高校完善了“稿件审核+意见反馈+成果转化”的闭环机制,及时将稿件修改意见和优秀稿件向会员反馈,引导会员树立精品意识。部分高校还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成果转化机制,确保有价值的建议能够被及时采纳并转化为实际行动,提高了建言献策的实际效果;将建言献策的情况纳入个人和单位的考核体系之中,并在年度工作实绩考核中给予激励。这些措施不仅提高了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的积极性,还促进了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10]。

二、当前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机制存在的不足

尽管高校在促进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参与渠道多样性、反馈机制的建设、评价体系、数字化程度、针对性管理服务等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

(一) 参与渠道有限,协同创新不够

一方面,建言献策渠道创新性不足。当前,党外知识分子在建言献策方面主要依赖传统的会议、论坛等平台,这些渠道难以覆盖更广泛的群体和领域^[11]。传统渠道通常缺乏持续性的互动和交流机制,难以形成有效的反馈循环,党外知识分子可能感到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响应。另一方面,大学中不同学科、领域的党外知识分子各有所长,但当前的模式对党外知识分子的内部细分不够,导致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党外知识分子之间缺乏充分的交流和合作,限制了建言献策的协同创新能力。

(二) 数字化程度较低,影响沟通效率

在当前数字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许多高校仍然主要依赖传统的纸质文档和电子邮件等方式进行建言献策的收集和处理,这种方式不仅效率低下,而且难以适应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需求。

第一,目前接收和处理决策咨询建议稿件主要依赖人工,采取的方法仍是传统的纸质稿和电子稿的呈递方式,缺乏有效的数字化管理机制。这种依赖人工处理的方式往往导致反馈周期较长,投稿人无法在线查看自己的建议是否已被接收、审理或采纳,效率低下。同时,由于缺乏透明的进度查询机制,投稿人总是需要通过电话或邮件等传统方式进行询问,无谓地耗费了时间和精力^[12]。第二,缺乏智能化流程,未能实现自动化的信息统计等功能。投稿人的建议一旦被采纳或批示,不能被第一时间记录下来,不利于后续的统计和评估,还可能导致成果的丢失或遗忘,影响对优秀建议的表彰和奖励。由于缺乏智能化的统计工具,统计建言献策成果的批示、采用信息需要人工反复核对和整理,费时费力,且影响准确性和可靠性^[13]。第三,数字化程度不足限制了高校在整合资源和利用数据方面的能力,无法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分析统战活动的影响和参与度,难以对收集到的信息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和利用。传统的建言献策流程中缺乏有效的数据管理和分析工具,使得有价值的信息难以被充分发现和利用,影响了建言献策机制的效率和效果^[14]。

(三) 管理方式笼统,评价体系不健全

一方面,大多数高校都出台了学校层面的科研绩效考核办法,但对党外知识分子的管理、服务方式缺乏针对性,激励机制不够灵活。例如,各民主党派省级委员会往往会发布年度参政议政课题,这是参政党在调查研究、建言献策领域的重要工作,此类课题的立项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理应纳入高校学术考评的成果类型,但各高校考核办法却鲜有列明。又如,各民主党派中央委员会、省级委员会、领导干部对资政建议专报的采用、批示,也是难能可贵的决策咨询成果,大部分高校对此类成果还没有明确表示认可。党内外知识分子“一刀切”的评级机制,会使得激励措施难以精准到位,无法真正激发党

外知识分子的潜力^[15]。另一方面,成果评价参数单一,衡量要素集中于批示或采纳的层级、课题立项的级别等,并未全面考量建议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长期影响,从而影响了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和可信度。有些建言献策的内容虽然没有产生立竿见影的成效,或是没有被高级别领导批示,也没有得到国家机关的采用、汇编,但从后续的影响力以及社会效果来看却具有深远的价值,此类成果在现有的评价标准之下难以获得认可^[16]。

三、优化完善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机制的对策建议

当前激励制度和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不仅削弱了党外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新动力,还影响了建言献策的质量和效果。为了解决上述问题,高校需要建立更加精细化和灵活的激励制度,针对不同学科和领域的党外知识分子实施差异化管理,同时促进跨学科的合作与交流,以提高建言献策的协同创新能力。为了改进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机制,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 在省市级层面构建高校数字统战工作平台

在数字统战的背景下,统战部门和教育部门应协力打造数字化平台,以数字化手段提高建言献策的效率和质量,确保信息的及时分享与反馈,进一步激发党外知识分子的参与热情和创新动力。

第一,建立数字化统战平台。引入先进的数据分析技术和智能化工具建设省市级数字化统战平台,用于收集、整理和处理党外知识分子的建言献策,是实现“数字统战”、提高建言献策机制整体效能的重要举措。平台应具备易于使用的界面和强大的功能,并逐步提升用户体验,支持用户轻松提交建议、查看进展和接收反馈,实现信息的高效流通和管理^[17]。

第二,利用数字化统战平台优化对高校党外

知识分子的建言献策服务工作。在选题策划方面,要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当前社会热点和高校发展需求进行分析,为党外知识分子提供针对性选题指导;通过数据分析识别关键领域和发展趋势,帮助党外知识分子聚焦重点问题,提高建议的实用性和前瞻性。在信息分享方面,利用数字化平台实现信息的即时共享,为党外知识分子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通过社交网络等途径,促进不同领域的知识交流与合作,激发创新思维;利用数字技术实现精准信息推送,将相关的政策动态、研究成果、会议信息等及时送达至党外知识分子,以便他们能够在充分了解背景信息的基础上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建议^[18]。要充分开发大模型、虚拟现实等高新科技潜能,创新建言献策服务功能,使党外知识分子可以突破地域限制,在虚拟环境中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与讨论;运用数据挖掘和可视化工具,对党外知识分子提出的建议进行量化分析,为决策者提供直观、科学的参考依据;建立在线智库网络,通过知识管理系统汇聚党外知识分子的专业知识;推广使用数字协作工具,促进跨领域、跨地域的党外知识分子协同工作;利用网络舆情分析工具,了解社会公众对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的反响和态度,为评估建议的社会影响力提供数据支持;开发互动式的政策模拟游戏,在模拟环境中测试和优化建议^[19]。

第三,开发高效的数字化反馈功能,自动跟踪建议的处理流程,实时发送进度报告和处理结果,确保建议得到确认、评估和反馈;利用自动化工具,提高反馈的透明度和及时性,做到“凡事有交代,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20]。

(二)在高校内建立常态化建言献策激励机制

构建积极有效的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激励机制,必须注重系统性,激励机制的设计、优化和效能发挥应该遵循系统性原则,推进知识分子激励体制机制的系统性变革。

第一,充分发挥高校智力优势,优化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服务管理工作。各高校应为党外知识分子建立多样化的参政议政参与渠道,党外人士可通过党委统战部组织的党外人士座谈会、校情通报会、征求意见会等途径提交意见建议书面材料,也可直接向党委统战部提交意见建议书面材料,方便党外知识分子提出建议和意见;建立有效的学习交流机制,促进党外知识分子与政府部门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提高建言献策的传递效率和准确性;定期举办建言献策经验交流沙龙、参政议政工作指导会,鼓励党外知识分子多为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成立建言献策工作室,选拔建言能力突出的青年党外知识分子,鼓励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党外知识分子进行交流和合作,形成合力,推动建言献策的协同创新;加强分类指导,针对校内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在专业特长、活跃程度等方面的不同特点,采取搭建平台、组建团队、协调调研经费、联系调研单位、安排挂职锻炼等措施,促进建言献策团队协作成果^[21]。

第二,健全适应不同建言献策活动特征的分类激励机制。应依据不同类型建言献策活动的发展规律和要素条件,健全党外知识分子分类激励政策,如根据决策咨询的内容,将其划分为党政理论研究、政策和立法建议研究、舆情和突发事件应对、国情考察和社情民意反映等类型,杜绝用“一刀切”的方法对从事不同建言献策活动的党外知识分子进行评价与管理。分类激励制度应符合不同类型决策咨询的发展规律与要素条件,而且需要体现不同专业、不同岗位、不同层次党外知识分子特点。在项目资助、职称评审、建言献策评奖等方面也要对从事不同类型建言献策活动的党外知识分子体现差异性,并根据不同建言献策活动选择合理的评价周期^[22]。

第三,健全适应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化激励机制。要尊重党外知识分子的成长规律和发展需求,建立覆盖其全职业生涯的激励制度,构建针

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性激励体系。完善针对不同发展阶段党外知识分子的分类评价体系,对于已有较为丰富的参政议政经验的党外知识分子,更多从建言献策的重大社会反响的角度进行激励,尤其是鼓励理论专家在人才培养和社会公共服务上承担更多责任;而对于青年党外知识分子,则更多从建言献策的价值与参与度、完成度的角度进行激励。建立健全高层次人才的社会荣誉性奖励机制,支持他们成为专业领域的“智囊团”;健全中青年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贡献性奖励机制,激励他们积极投身社会调研,多参与、多尝试。

第四,健全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的双重激励制度。应丰富激励手段,强化精准激励,坚持物质奖励和精神激励并重,兼顾短期和中长期激励。建立以产出、贡献和社会价值为导向的建言献策奖励机制,坚持从多维度激励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在薪酬上给予绩效奖励,在精神上给予荣誉激励,在事业发展上给予晋升激励。激发高校和社会奖励活力,鼓励支持社会层面赞助,设立表彰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突出贡献的多层次荣誉奖项。建立健全以政府奖励为导向、高校和社会力量奖励为主体的建言献策奖励体系,特别是强化建言献策奖励对党外人才的荣誉导向和激励作用。

(三) 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

评价体系的科学与否不仅决定建言献策的质量和效果评估,还会影响党外知识分子的参与积极性。为此,高校需要建立一套更加科学、全面和透明的评价体系,采用多元化的评价方法,以提高建言献策机制的整体效能。

第一,教育部门应出台《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激励办法》,指导辖区内高校职称评审改革、科研工作量认定、专业技术岗位考核,将咨政报告、产生较大社会效益的横向研究项目纳入专业技术岗位考核、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科研工作成果等工作业绩评价体系,制定可量化、

操作性强的具体办法。

第二,各高校应当在教育部门的指导下,建立、健全建言献策成果分级分类评价机制,将决策咨询成果科学地转化为定量指标,纳入个人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科研工作成果考核、评比、奖励等工作业绩评价体系中。同时,可以从物质和精神层面给予适当的奖励,以激发党外知识分子的参与热情和创新活力。具体实施细则应由各高校自行制定,并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统战部、教卫工作党委备案,确保评价与激励机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23]。

第三,高校应扩大建言献策成果的认定范围,尤其是将党外知识分子所在党派、界别的代表性成果纳入其中。主要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各民主党派中央信息采用、形成专题报告或写入立法、政策性文件的意见建议;省级以上人大机关立案的议案以及采用的重点建议;省级以上政协机关立案的提案以及采用的社情民意信息;各民主党派中央、省(市)委会向政协提交的大会发言、集体提案、界别提案;中央各部委、各民主党派中央,省(市)级党委、政府、人大、政协采纳的决策咨询成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政府、民主党派委员会发布的决策咨询立项课题和采纳的决策咨询建议。

第四,创设高校决策咨询代表作制度。决策咨询代表作制度是决策咨询评价体系改革的重要方向,通过合理设计和实施,能够促进咨询研究的质量和 innovation,但同时也需要解决伴随的挑战和问题。决策咨询代表作制度是一项决策咨询评价体系的改革措施,旨在克服以往对咨询报告数量和发布机构级别的过度依赖,转而注重咨询成果的质量和对决策的实际贡献。这一制度允许研究者提交1至3份最能代表其咨询水平和创新性的咨询报告或研究报告,供专家评审,以此来评定其职称晋升或咨询成就。通过这种方式鼓励咨询专家潜心研究,有助于追求高质量的决策咨询成

果,打破对决策咨询数量的过度重视,减少决策咨询的形式主义,促进咨询研究的严谨性和实用性^[24]。决策咨询代表作制度需要解决评价标准的主观性和可量化问题,并防止可能存在的机会主义行为,如学缘关系影响评审结果的客观性,确保评审专家的权威性和公正性,正确处理与主流决策观点不一致的咨询成果的评价。建议加强同行评议的透明度,建立科学的咨询专家库,健全同行专家评审不端防范制度,注重发挥咨询共同体和科学计量方法在专家筛选中的作用,明确评审原则和标准,确保评审过程的专业性、保密性和集体协商性^[25]。

【参考文献】

- [1] 高飞. 大学治理视阈下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的作用 [J]. 内蒙古统战理论研究, 2021 (3).
- [2] 郝宇青, 毛习辛, 宋以. 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引领状况探讨: 基于上海市高校的一项调查 [J].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3 (6).
- [3] 刘晓俏. 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参政议政影响因素分析 [J]. 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0 (3).
- [4] 广西财经学院扎实推进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工作提质增效 [EB/OL]. [2024-08-11]. http://m.jyb.cn/rmtzcg/xwy/wzxw/202305/t20230516_2111041843_wap.html.
- [5] 同济大学知联会参与“上海党外知识分子专家服务团助力自贸试验区建设专项行动” [EB/OL]. [2024-08-11]. <https://news.tongji.edu.cn/info/1003/85360.htm>.
- [6] 上海交通大学党外知识分子参政议政专题辅导报告举行 [EB/OL]. [2024-08-11]. <http://news.sjtu.edu.cn/zhxw/20220525/171790.html>.
- [7] 上海交通大学统战部. 我校党外知识分子为支持疫情防控工作积极贡献力量 [EB/OL]. [2024-08-11]. <https://tzb.sjtu.edu.cn/post/3438>.
- [8] 广西高校纪念“五一口号”发布75周年活动在桂林举行 [EB/OL]. [2024-08-11]. <https://www.gx.chinanews.com.cn/sz/2023-05-10/detail-ihcphmup3082165.shtml>.
- [9] 刘传辉. 新时代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工作: 思想现状及应对引领以西部地区某高校为例 [J]. 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 (1).
- [10] 王俊玲, 李萍. 新形势下合理规划高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思考 [J]. 求实, 2012 (S2).
- [11] 宾月景, 朱良华. 扎实推进广西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工作提质增效研究 [J].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4 (1).
- [12] 马宁. 新媒体视域下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探析 [J]. 黑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 (3).
- [13] 刘自助, 张卫刚. 新时代上海高校无党派人士队伍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以上海交通大学为例 [J].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 (6).
- [14] 李霞.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数字统战的功能、困境及进阶 [J]. 领导科学论坛, 2024 (5).
- [15] 高振勤, 赵盼盼. 新时代高校统一战线工作的实践与创新 [J]. 内蒙古财经大学学报, 2024 (3).
- [16] 黄群俊. 新时代高校基层党组织统战工作机制与实践路径 [J]. 决策与信息, 2024 (3).
- [17] 许多. 新时代基层统战工作平台建设研究: 以天津市宁河区为例 [J]. 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4 (1).
- [18] 李荣志, 张晓宇, 等. 新形势下数字统战标准体系建设的框架与路径: 以江苏数字统战标准体系建设为例 [J].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3 (2).
- [19] 谢静. 数字统战与城市治理现代化: 上海的实践与经验 [J].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 (4).
- [20] 闫红果. 人民政协凝聚党外青年知识分子政治共识研究 [J]. 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2 (4).
- [21] 张婷, 蔡知远. 问题与策略: 无党派人士队伍建设的贵州探索 [J]. 贵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3 (1).
- [22] 鲍跃华. 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中的无党派人士作用要求与发挥路径 [J].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3 (1).
- [23] 姚跃传. 论加强新时代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精准性 [J]. 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3 (1).
- [24] 俞立平, 张矿伟, 蒋长兵. 推进代表作评价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J]. 情报学报, 2021 (4).
- [25] 张曙光, 王红芳. 代表作评价制度的要素、困境与完善路径: 基于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视角 [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23 (2).

责任编辑: 唐 倩

以统一战线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伟力

赵晓娥 张雪梅

(中共西安市委党校 陕西 西安 710054)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时代脉搏,立足中国实际,总结改革开放40多年的现代化建设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初步建构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拓展了人类实现现代化的新路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就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提出了完善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政治作用的政策举措。只有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重要法宝作用,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内在潜能,才能广泛凝聚力量、创新路径,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的改革任务,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统战力量。

关键词:统一战线 凝心聚力 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218 (2025) 02-00-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时代脉搏,立足中国实际,总结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现代化建设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初步建构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拓展了人类实现现代化的新路径。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全面部署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改革要求和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法宝作用,对统一战线工作提出新要求,在党的二十大报告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分别指出,“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

之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凝心聚力、奋发进取,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实现现代化的新选择

(一) 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丰富和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丰富和完善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会长马尔科姆·麦克唐纳时提出了

收稿日期: 2025-01-15

作者简介: 赵晓娥,女,中共西安市委党校、西安社会主义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政治学、统一战线理论;张雪梅,女,中共西安市委党校、西安社会主义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主任,研究方向:政治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

“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概念。在随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考虑到“四个”一词的局限性，将其去掉，改称为“中国式的现代化”。紧接着，邓小平对“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要求作了进一步揭示和阐发，指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并逐步对中国式的现代化赋以经济衡量标准和战略目标规划，这就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1000 美元的小康目标和“三步走”的战略部署。

20 世纪末，经过 20 多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由此，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当人类社会跨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并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党的十七大依据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社会转型出现的新特征以及国际环境发生的新变化，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如强调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生态文明等，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迈出稳健的步伐，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两个结合”，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相继提出了一系列推进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创新理论，例如“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新发展理念”“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乡村振兴等，为赋予中国式的现代化更加丰富而深刻的内涵，逐步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和实践基础。2020 年 10 月，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特别强调：“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指出，在百年奋斗中，“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从此，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式现代化”一词正式进入人们的视野，不断出现在党和国家的重要会议和文件中。2022 年 10 月，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深入剖析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中国特色，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中国式现代化成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依托。

（二）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中国智慧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内涵的丰富和实践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政党开始突破传统思维，以中国共产党为榜样，探索适合自己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正如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3]。

其一，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发展模式的选择提供智慧。中国式现代化丰富了世界现代化理论，打破了现代化只有“单一模式”的谬误认识，提出了一系列满足时代要求的“新”的现代化要素，如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新型市场化、新型大国外交关系、新发展理念、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从严治党等。这些“新”，共同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总体特征，是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智慧结晶，为解决一系列世界性难题提供了重要参考和积极

力量，充分体现了在世界历史格局中现代化的多种样态，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鼓舞着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信心。

其二，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经济发展、技术创新提供智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共同明确为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它们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经济制度，为促进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重要历史时刻，我国提前 10 年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占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的中国全面消除的绝对贫困。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在相互促进中实现互利共赢。进入 21 世纪，中国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资吸收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 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3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此外，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推进，中国不断加大科技创新方面的投入，加速创新技术的产业化和市场化，成为国际舆论热议的“新兴技术应用热土”“全球重要创新高地”^[4]。所有这些成就，极大增强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打破经济性和技术性壁垒、加大国际交流、发展高科技的勇气。

其三，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社会稳定、文明共存提供智慧。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实践遵循世界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紧密结合本国国情，在全球性问题加剧、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的形势下，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团结联合尽可能多的爱好和平的国家共同为 global 稳定发展而努力。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更具创新创造性，例如提出并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丰富了人类文明新内涵，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动了人类文明新发展。

二、统一战线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法宝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形成和丰富、实践的推进和发展，都离不开人的关键作用。统一战线为中国式现代化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巩固了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基础。

（一）统一战线巩固了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政治基础

我国的政治制度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体系，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当家作主，而要实现全体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统一战线是重要载体。

早在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再次指出人民民主与统一战线的密切关系。在 1954 年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时，毛泽东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仍将是全国各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统一战线的政府”。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党和国家领导人更是多次在重要会议上明确表达统一战线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特性，强调统一战线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1979 年 6 月 15 日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开幕，邓小平作了《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的重要讲话，指出：“人民政协是我国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已经发展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1980 年，在《统

一战线和人民政协要为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作出贡献》的讲话中他指出：“人民政协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的重要组织，也是我们政治体制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实行互相监督的重要形式，它在我国各族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明确了人民政协的统一战线组织属性，以及它在实现人民民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形势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规律，提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七个聚焦”的分领域改革目标之一。在此阶段，统一战线将继续通过实施一系列民主协商举措，包括政党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等形式，直接影响民主动员、民主表达、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等民主功能实现的广泛性、真实性和整体性，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载体，巩固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政治基础。

（二）统一战线巩固了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文化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是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化，脱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式现代化就丧失了根本。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是“两个结合”的产物，是新时代做好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遵循，贯彻落实好这一重要思想关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一方面，统一战线注重包容多元文化的差异。中国的民族、地域、宗教、语言等组成要素的多样性，决定了中华文化的多元性。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就是因为其可以包容一切文化的差异，顺应多元文化共存的趋势，使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得以保留和传承。另一方面，统一战线致力于发掘各类文化的共性。团结联合是统一战线的本质，统一战线坚

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以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凝聚起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巨大向心力，在广大统战成员中广泛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进行理想信念引导和宣传教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不断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而努力。同时，统一战线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础上的统战文化，引领各族群众、各界人士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提高对中华文化的自信。

（三）统一战线巩固了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经济基础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统一战线汇聚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民智民力。一是非公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发展强劲稳定的动力，是创造就业的最大来源，是越来越重要的税源。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主体，是实实在在不断践行先富带动后富理念的重要主体。统一战线在教育、引导、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中发挥着重要法宝作用。二是党外知识分子为共同富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党外知识分子是我国发展科技教育事业、兴办高新科技工业园和知识经济产业、促进经济决策的科学化的重要力量。党外知识分子还是“智力扶贫”“智力支边”“医疗服务”“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统一战线将党外知识分子工作作为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工作^[5]，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

（四）统一战线巩固了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社会基础

统一战线注重通过沟通协调、教育引导、联谊交友的方式团结力量，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统

一战线通过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提高广大社会力量辨别政治是非的能力，保证正确的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坚定广大社会力量的“四个自信”，从而齐心协力共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与此同时，统一战线通过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广泛深入了解广大群众的诉求和意愿，及时化解基层社会矛盾，解决基层群众的困难，为实现共同富裕减少阻力、增加助力、形成合力。

（五）统一战线是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力量来源

一是统一战线凝聚生态环境领域的专家学者。在生态环境越来越受到重视和关注的大趋势下，生态领域的学者们充分发挥智力优势，服务生态环保工作，为解决我国乃至全球生态环境问题贡献智力。二是统一战线积极调动志愿者力量。志愿者们参与生态环境的治理实践，对生态环境的治理和保护进行实时监督，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三是统一战线积极引导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自觉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企业生产经营各个环节，自觉加大企业环保科技投入和环保设施的规范运行。

（六）统一战线是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重要保障

新时代的统一战线具有四大特性：空前广泛性、巨大包容性、显著社会性、鲜明多样性。在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大业的实践中，统一战线充分发挥了这四个特性的重要作用。在贯彻落实“一国两制”制度、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工作中，统一战线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获得包括广大海外华人、华侨、国际友人在内的广泛支持。同时，相关党政部门运用各种资源、开辟各种渠道、抓住各种机会，灵活多样地开展关于台湾问题的的工作，鼓励和支持新的社会阶层为遏制“台独”分裂势力的活动、促进祖国完全统

一贡献智慧和力量。

三、做好新时代的统一战线工作，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伟力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我们搞统一战线，从来不是为了好看、为了好听，而是因为有用、有大用、有不可或缺的作用。”统一战线巩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基础、提供了物质保障和精神动力，在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为了更好发挥统一战线的重要法宝作用，还需要把握好统一战线工作的四对关系。

（一）全面把握统一战线工作中的政治性和人民性

统一战线工作说到底是团结人联合人的工作，是政治性很强的工作。毛泽东同志曾形象地说：“什么叫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就是把我们的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在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过程中，一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充分考虑人民的利益诉求。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改革要求，积极健全协商民主机制，健全基层民主制度，及时有效地解决人民的急难愁盼。另一方面，要坚守政治底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处理好一般与特殊、多数与少数的关系，不因个别人的特殊利益损害多数人的利益，甚至是民族和国家的利益。

（二）正确处理统一战线工作中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

社会多样性的发展趋势是国家进步、社会文明的表现，增强了社会内生活力和竞争力。然而，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是每个中华儿女必须共同坚守的原则，多样性必须服从一致性。在现实工作中，统一战线工作者、统战职能部门、党校和社会主义学院等机构和部门要担负起宣传党的统战理论政策的职能，加强党政领导干部对

统战理论政策的深度掌握,加强广大群众对统战基本知识的普遍了解。同时,着重开展与民族宗教界及留学人员、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新生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交流联络活动,凝聚起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行动合力。

(三) 持续增强统一战线工作的主动性和前瞻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强调要“构建大统战格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任务中重申,要“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所谓“大”,意指范围广大,一方面是统战工作的对象要广大,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还包括国际上爱好和平,支持共同发展的群体、个人。另一方面是做统战工作的主体要广大,包括所有党政机关和广大党员干部。在大统战工作格局下,中国积极倡导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与世界各国交流、分享经验,竭力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并在国际舞台上团结发展中国家共同争取应有的国际话语权,真正实现双赢、多赢。

(四) 不断提升统一战线工作的系统性和创造性

一方面,统一战线工作是一项系统性很强的工作,做好统一战线工作需要建立一套科学的理论和实践体系,需要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兼顾国内国际两个环境,考虑全局和局部、集体和个人等各方面的关系。另一方面,统一战线工作需要站在时代大潮中不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分析问题,开辟更多更广的统战渠道,增强做好统战工作的改革创新精神,不断丰富统战理论和实践体系。

【参考文献】

- [1] [2] [3] 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 [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2022: 12-16.
- [4] 两会世界眼 | 中国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创造机遇和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引发国际热议 [EB/OL]. 新华网, (2023-03-07). http://big5.news.cn/gate/big5/www.news.cn/2023-03/07/c_1129417205.htm.
- [5] 秦国生. 做好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是形势和使命的需要 [N]. 光明日报, 2015-08-31 (11).

责任编辑: 李 蕾

关于构建科学化党外代表人士工作体系的思考

雷波

(铜川市委统战部 陕西 铜川 727031)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外代表人士在对象分布、工作机制、成长情况、作用发挥等方面都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同时也对党外代表人士工作体制机制提出了许多新挑战。当前,党外代表人士工作体系中还存在工作格局、工作氛围、工作体系、队伍素质等方面制约因素,必须构建科学化党外代表人士发现储备、培养成长、推荐使用、监督管理等工作体系,建立“党外人士—党外代表人士”梯队成长和认定体系、以政协为主其他为辅党外代表人士作用发挥平台体系和党外代表人士政治生活服务机制等,推动党外代表人士工作体系进一步完善、党外代表人士工作能力进一步提升。

关键词:党外代表人士 统战工作 统战领域改革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218 (2025) 02-00-0

“培养使用党外代表人士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1]。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大党外代表人士培养、选拔、使用工作力度,努力培养造就一支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较强代表性和参政议政能力的党外代表人士队伍。”^[2]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如何持续加强党外代表人士工作体系建设,探索形成科学规范完整的党外代表人士发现、培养、使用、管理机制,有利于推动党外代表人士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发展,有利于提升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效能,有利于发挥全过程人民民主政治优势,对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法宝作用、凝聚社会各界人心和力量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时代党外代表人士工作现状

党外代表人士是做好统战工作的源头活水,也是发挥统一战线法宝作用的重要支柱。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数量和质量、党外代表人士的作用发挥情况是决定统一战线工作成效的重要因素。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党组织深入开展党外代表人士工作,持续推动党外代表人士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发展。同时,伴随着经济社会和统一战线工作的发展,党外代表人士工作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

(一) 从对象分布来看,新时代党外代表人士工作呈现出许多新特点

党外代表人士点多面广,各地区工作对象侧重各有不同。比如,高校和科研机构多的地区、

收稿日期: 2025-01-15

作者简介: 雷波,男,陕西省铜川市委统战部研究室主任,研究方向: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

城市党外知识分子较多,西部地区民族界党外代表人士资源相对丰富,宗教界代表人士在各教派、各地区表现各有差异,非公经济人士资源数量和质量在沿海和内陆表现差异较大,沿边沿海地区侨界代表人士资源较多。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各界人才加速流动,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党外代表人士界别和范围越广,相对来说,越到基层党外代表人士的界别和数量也就越少。各地区、层级党外代表人士资源分布上的差异,决定了党外代表人士工作的难度,也对做好新时代党外代表人士工作提出了许多新挑战。

(二)从工作机制来看,党外代表人士工作方式方法需要与时俱进

长期以来,在革命、建设、改革历程中,我们党形成了一套卓有成效的党外代表人士工作机制。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世情、国情、统情都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正在深入推进,基层群众参政议政热情不断高涨。人民群众对党外代表人士的发现、使用、培养、管理等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有了许多新要求,对党外代表人士的履职效能有了很多新期待。比如,党外代表人士发现流程和渠道还不够规范科学,各级党组织开展党外代表人士工作的积极性还有待进一步增强,分层分级开展党外人士、党外代表人士评价认定方面还不够完善,党外代表人士推荐使用平台尚未形成完整体系和流程,对党外代表人士的有效监督管理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等,这些都要求我们与时俱进,不断深化党外代表人士工作体制机制改革,让党外代表人士工作更加符合时代需要和人民期盼。

(三)从成长情况来看,党外代表人士成长中面临着许多新问题和新困惑

党外代表人士是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党外代表人士的履职效能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在党外代表人士的健康成长中,

还存在一些体制机制性难题亟待破解。比如,作为普通群众,如何成为党外人士实现参政议政愿望、进而成为党外代表人士,如何监督党外人士、党外代表人士;作为党外人士,权利和义务都有哪些,如何常态化做好个人参政议政能力提升;作为党外代表人士,如何通过统一战线推荐到其他平台发挥作用……这些问题,也对做好新时代党外代表人士工作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要求。

(四)从作用发挥来看,党外代表人士在治国理政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党外代表人士作为统一战线的重点工作对象,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从党的治国理政探索来看,统一战线工作与全过程人民民主正在深度融合。特别是在各层级协商民主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党外人士、党外代表人士身影出现在了协商会场。在参政议政方面,党外代表人士通过人大、政协等各种平台,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各级重要领导人选协商等工作,结合党和政府工作安排,开展专题调研工作。在民主监督方面,以民主党派人士、无党派代表人士、党外知识分子等为主的党外代表人士通过工作调研、提出意见建议、听取报告、列席会议等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互相进行民主监督。在密切党群关系方面,党外人士和党外代表人士有效发挥党和群众桥梁纽带作用,推动党的治国理政方针政策广泛宣传。

二、党外代表人士工作体系存在的制约因素

作为党的统战工作的重要因素,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水平和质量事关统一战线工作质量。近年来,在各级党组织的重视下,党外代表人士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但面对党外代表人士工作领域发生的新情况、新变化,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我们用改革的视角,及时探索和总结党外代表人士工作规律,并提出系统解决方案,为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提供源头活水。

（一）全党重视的工作格局有待进一步健全

“统战工作是全党的工作，必须全党重视、大家共同来做，构建完善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3]党外代表人士工作是一项系统性工作，需要全党重视，统战部门统筹协调，各行业、各领域通力配合。在思想认识上，一些领导干部将党外代表人士的发现储备范围仅限于本部门机关干部，对分管行业党外人才重视不够；一些领导干部对分管领域党外优秀人才业务业绩重视多，但对他们的政治表现、政治需求了解不够。在权责体系上，党外人士、党外代表人士认定管理工作流程不规范，统战部门权力责任过于集中，不利于发挥其他行业部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平台体系上，党外代表人士使用平台主要集中在政协，对其他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的推荐使用缺乏制度性流程和机制。

（二）基层基础工作氛围有待进一步优化

基层统战工作是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的根基，也是人民群众对统一战线工作认识的基础。只有结合全过程人民民主工作，全方位加强基层统战工作宣传话语体系、政策制度体系、参政议政体系建设，才能有效推动统战工作、党外代表人士工作接得了地气，飞得进寻常百姓家。在实践中，基层群众对统一战线参与感不强、统战意识淡薄以及统战话语不够接地气等问题还经常发生。比如，在基层统战工作中，没有形成接地气的、老百姓“听得懂”的基层统战话语体系；基层统战工作职能泛化虚化、不接地气，与组织、宣传、社会工作、政法等部门职责界限模糊；基层统一战线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与基层治理体系互相融合工作做得还不够，特别是面对基层统战界别相对较少、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一些党组织对基层统战工作的指导、管理生搬硬套“五大关系”工作方法，导致基层统战工作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时有发生；基层统战与老百姓的政治生活存在“两张皮”现象，基层群众对党

外代表人士不熟悉、不了解，缺乏相应的党外代表人士推荐和监督渠道，在调动基层群众参与统战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方面还有待加强；基层统战工作与村（社区）议事协商会议、企事业单位工会、妇联等平台联系不够紧密，没有形成相互促进的基层大统战工作氛围。

（三）党外代表人士工作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党外代表人士工作对象多元、层级复杂，工作中各层级、各领域面对的工作侧重也各有不同。长期以来，根据统一战线需要，我们与时俱进形成了一套稳妥有序的工作方式方法，但在具体工作中却很少有上升到全国层面统一的操作流程和方法。这也为统一战线工作体系和工作能力的现代化建设带来了新挑战，同时也增加了社会各界对统战工作的理解难度。比如，在党外代表人士的发现储备工作中，没有形成系统的工作流程和机制，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基层党组织参与党外人士推荐、储备工作积极性不高，基层群众对统一战线的参与感不强。在党外人士、党外代表人士认定方面，统战部门权力、责任过于集中，难以有效调动行业部门党组织的积极性。在党外代表人士培养方面，政治培训内容不接地气，集中培训多、个人常态长效化学习机制少，考核评价机制不够完善科学，培训效果不明显。在党外代表人士成长建设方面，对党外人士、党外代表人士的分级模糊，没有形成科学有序的党外人士成长体系。在参与实践锻炼方面，对党外代表人士参与调研、参政议政、参加协商等方面保障支持力度不够。在党外代表人士推荐使用方面，主要依托政协平台，面向其他党政机关、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领域的推荐机制和平台建设尚不完善。在党外代表人士监督管理方面，针对党外代表人士多头管理、多头履职的情况，没有形成互相协同的监督管理体系，各级党组织统战委员、统战联络员在履行党外代表人士监督管理方面作用发挥不足。

(四) 党外代表人士的素质和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党外代表人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党外代表人士的能力素质关乎统一战线的公信力,也决定了统一战线的作用发挥水平。从实践情况来看,当前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虽然取得一定成果,但由于数量多、来源广,人员队伍素质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有的党外代表人士受市场经济影响,过分追求政治权力、忽视政治义务;有的党外代表人士参加统战活动主动性不够,参政议政意愿和能力不强,建言献策针对性不强、质量不高;有的党外代表人士主动学习意识淡薄,对统战方面的政策知识了解不够。

三、构建科学化党外代表人士工作体系的对策建议

党外代表人士工作是一项全局性系统性工作,党外代表人士的质量决定了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的质量。同时,党外代表人士情况复杂、来源多样,工作中面临的情况各有不同。大统战工作需从全局着眼,从发现、培养、使用、管理等方面同时发力,逐步破解党外代表人士工作氛围营造、来源入口、培养培训、成长路径、推荐平台、监督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稳妥有序推动党外代表人士工作质量不断提升。

(一) 发现储备体系

发现和储备是做好党外代表人士工作的基础,要与时俱进完善发现储备机制,逐步构建由基层群众推荐、下级党组织推荐、行业部门及社会组织推荐、界别领域推荐相结合的多元化党外代表人士发现储备体系。一是结合统战工作责任制落实,发挥各级党组织的统战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健全下级党组织向上推荐党外代表人士的工作机制,构建下级党组织积极推荐、上级统战部门统筹调度的党外代表人士储备机制,及时将

符合条件的人才纳入统战工作视野。二是广开言路,畅通基层群众推荐党外代表人士的渠道和方式,探索开展群众推荐、自荐党外人士的工作机制和流程,推动基层群众更好融入统一战线、参与统一战线。三是用好党的组织工作体系,发挥好行业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党组织的作用,拓宽党外人士发现储备渠道。四是改进和优化社会各界别党外代表人士发现和储备机制,通过调查研究、征求意见、定性推荐等方式,持续推动社会各界别做好党外代表人士发现和储备工作。

(二) 培养成长体系

党外人士成长既要靠自身学习和觉悟,也要靠组织培养。要与时俱进探索和掌握党外代表人士成长规律,构建“普通群众—党外人士—党外代表人士—平台推荐职务”的党外代表人士成长体系。一是建立“党外人士—党外代表人士”梯队成长体系,明确党外人士和党外代表人士界限,设定党外人士成长为党外代表人士的政治标准、年限标准、评价标准。二是优化党外人士认定机制,探索将党外人士认定权限下放到部分有承接能力的行业党组织,开展行业党组织认定、统战部门备案和定期调度的党外人士认定工作机制,建立从一线发现、认定党外人士工作机制。三是积极开展党外代表人士综合评价体系建设工作,结合各领域、各层级实际,分级分类确定综合评价相关因素,构建由统战“共性评价因素+各领域个性因素”相结合的党外代表人士综合评价体系,画好党外代表人士的政治肖像。四是针对性做好党外代表人士的培养锻炼工作,将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和素质能力提升纳入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建设的总体规划,通过推荐学习内容、举办党外人士培训、参与调查研究、邀请列席会议、开展挂职锻炼等方式,推动党外代表人士履职能力和综合素质不断提升。

(三) 推荐使用体系

党外代表人士工作的关键在于发挥作用,要结合各级统一战线工作实际,不断拓宽党外代表

人士发挥作用的平台体系，完善党外代表人士推荐使用流程，构建以政协为主，其他党政机关、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等为辅的党外代表人士发挥作用平台体系，与时俱进满足党外代表人士在参政议政方面的新需求。一是强化政协作为党外代表人士履职主阵地作用，细化党外代表人士推荐人选的政治标准、年龄界限、界别要求、综合评价等内容，确保把合格优秀的党外代表人士推荐到政协平台上。二是统筹推进党政机关党外干部的选拔任用工作，强化与组织部门协作，完善后备党外干部梯队建设。三是探索做好推荐党外代表人士担任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管理职务工作，加强对现有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党外管理人员的统战工作。四是结合基层治理实际，推动党外代表人士工作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及时将村（社区）党外乡贤能人、企事业单位优秀党外人才纳入统战工作视野，发挥好基层村（社区）协商议事平台以及企事业单位工会、妇联等基层群众工作平台的统战功能，为基层群众认识统战工作、参与统战工作营造良好的氛围和环境。

（四）监督管理体系

党外代表人士的形象事关统一战线形象，在党外代表人士工作中，要树立“党外不是例外”的意识，完善党外代表人士协同监督管理机制。要通过积极发挥党外代表人士所在单位党组织、所在党派或团体、统战部门、监察部门的作用，推动党外代表人士加强自身建设，维护统一战线良好形象。一是积极开展法律法规、团体章程等学习培训，通过集中培训、个人自学、实践活动

等方式，推动党外代表人士常态长效化学习法律法规，形成良好的个人素养。二是完善党外代表人士管理制度，推动党外代表人士政治表现与参政议政情况进考核、进述职、进档案，探索运用民主评议、考核评价、述职述廉、谈心谈话等方式，增强身边群众对党外代表人士的监督。三是建立协同联动监督管理机制，在明确党外代表人士所在单位党组织主体责任的基础上，做好所在单位、统战部门、所在党派团体的协同管理工作，建立党外代表人士业务工作与政治工作协同监督、定期沟通机制，探索邀请统战部门参与党外代表人士提拔使用、述职述廉等重大事项，建立党外代表人士重大事项相互通报机制，将统战履职和基层群众评价纳入综合考核管理体系。四是发挥各级党组织的统战工作委员、统战联络员作用，完善党外代表人士政治生活服务工作，为党外代表人士履职提供必要的学习培训、调研等保障；为党外代表人士建好政治档案、履职档案、廉政档案，作为人才培养、综合评价、业绩考核、推荐使用的重要依据。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 [J]. 求是, 2024 (2).
- [2]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2016: 175.
- [3] 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 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广泛力量支持 [N]. 人民日报, 2015-05-21 (01).

责任编辑: 李 蕾

参政党提高调查研究能力的目标与路径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重要论述精神

王 凯

(甘肃社会主义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摘 要: 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征程中,参政党应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着力提高调查研究的能力水平,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要论述,努力在调查研究的求深、求实、求细、求准、求效上下工夫,发挥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和效能。

关键词: 参政党 调查研究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中图分类号: D6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218 (2025) 02-0036-06

新形势下,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科学谋划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明确了新形势下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原则和重点任务。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各民主党派应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改革新征程中进一步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和效能。

调查研究是参政党履行职能的“基本功”,无论是开展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还是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都离不开调查研究。谋划改革“为什么改”“改什么”“怎么改”都需要调查研究提供依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研究、思考、确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和重大举措,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异想天开更不行,必须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1] 围绕政治、经济、社会、

文化、生态等重大问题和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参政党只有先通过调查研究,才能真实反映社情民意、有效开展协商讨论,进而向执政党和国家机关提出“预防”“修补”“调整”“改进”性的意见建议。以人民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改革”本身与参政党职能之间共同的内在要求和相通的价值路径、技术路径。

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也是民主党派的“传家宝”。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习近平,各民主党派杰出前辈如费孝通、张澜、黄炎培、朱学范、成思危、叶圣陶等,无不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立足“两个大局”,指出调查研究“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2]。他不仅身体力行、亲力亲为,调查研究

收稿日期: 2025-01-15

基金项目: 甘肃省 2023 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时代甘肃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效能提升策略研究”(2023YB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凯,男,甘肃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主任,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面:统一战线理论。

的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深山大川，而且不时告诫全党要重视调查研究工作。2023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将大兴调查研究作为在全党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加以部署。早在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发表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的首篇文章，题目就是《调研工作务求“深、实、细、准、效”》，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在调研工作中一定要保持求真务实的作风，努力在求深、求实、求细、求准、求效上下工夫。被誉为“调研五字诀”的“深、实、细、准、效”，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精髓要义，是习近平对调查研究实践经验的高度凝练和深刻总结，值得广大参政党成员认真学习和借鉴。

一、调研务“求深”：深入群众、深入基层

调查研究是人们在实践中对客观实际情况的调查了解和分析研究，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运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调查研究必须深入群众、深入基层。要从机关大院、办公室中走出来，下沉到田间地头、厂矿车间、居民社区、项目工地，和基层群众围在一起、干在一起、坐“一条凳”、喝“一壶茶”，“沉浸式”开展深度调研。毛泽东提出“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习近平也指出：“要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接地气、通下情，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解剖麻雀，发现典型，真正把群众面临的问题发现出来，把群众的意见反映上来，把群众创造的经验总结出来。”^[3]

参政党的调查研究与执政党及其他科研院所的调查研究有共性也有区别。执政党和政府部门的调查研究，较大一部分是为了制定相对宏观和长远的方针政策，如施政纲领、发展规划、法律政策等，调研成果落脚于政策过程相对“上部”的位置。自然、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调查研究则重

在发现、研究自然、社会的客观规律。参政党的调研虽也涉及这两方面内容，但更“主要是一种政策研究，更关注社会公众的利益诉求，研究成果更需要体现民主性，提出的意见建议主要是为领导机关的民主决策作出贡献。……其根本的出发点是为执政党的决策和决策执行提供支持和参考”^[4]。参政党的调研，是标准的从基层社会到“上层建筑”、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政策过程，是从“党外”的角度检验政策成效，反映社会真实“声音”，进而提出意见建议，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一环。如果调研脱离群众、脱离基层、不能深入，参政议政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参政党的地位和作用就必然弱化。

在制度实践中，参政党作用发挥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上热下冷”“头重脚轻”，许多高质量的信息与提案往往来自党派中央和省级委员会层面，而越往基层，作用递减。党派中央和省委会每年围绕选题赴基层开展调研，但毕竟时间和次数有限，而不少县（区）级的基层参政党组织与个体，虽身在基层，却没有充分参与到调研之中。因此，如何有效发挥参政党基层组织的作用推动调查研究走深走实，是提高参政党履职能力的一项重要课题。

二、调研务“求实”：实事求是、实话实说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根本观点。古语云：“见未真，勿轻言。知未的，勿轻传。”调查研究贵在求“实”，就是通过实地考察，走访交谈，将道听途说的信息去伪存真，做执政党及其政策成效的“一面镜子”。参政党调研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做到察实情、讲实话、献实策。相较于政府部门的调研，参政党的“上级性”相对淡化，更容易听到群众真实的声音。

一方面，要摸准摸透基层真实情况。习近平指出：“把调查研究做深做实，避免浮在表面、流于形式。”^[5]坚决反对调研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本本主义，避免“旅游打卡”式调研、“莅临检查”式调研、“电影剧本”式调研和

“蜻蜓点水”式调研。一是要轻车简从，简化公务接待，少给基层添负担。二是要善于运用科学调研方法，开展蹲点调研、优化“抽样”。毛泽东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曾指出：“调查研究极为重要……公社内部平调的情况，公社的党委书记不一定都知道……但是，有一个办法，三十个生产队他调查三个就行了，一个最坏的，一个中等的，一个最好的。”这是注意到抽样中的“点”所代表的“类”的范围和边界，通过不同的“点”涵盖更多的“类”，从而了解到“面”。三是要谋求第一手的数据材料。调研者或调研组要掌控调研的“主动性”，避免拿着“剧本”“被牵着鼻子走指定线路”。避免“只听成绩，不听问题”的“盆景式调研”，要既看“摩天大楼”，又看“背阴胡同”；既有“规定动作”，又有“自选动作”。面对调研对象，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既要开大会，也要开小会；既要问领导，更要问群众，采取“访谈+座谈”的形式，有的座谈应有意使领导“回避”以“广开言路”。毛泽东曾谈到“寻乌调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他们都给了我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6]。对有的问题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对“面有难色”的访谈对象，要留下联系方式，以期继续沟通。调研者要善于观察，提高探究真相、辨别真假的能力。

另一方面，调研成果形成的社情民意信息、提案、协商发言材料等要“实话实说”，做到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要按照习近平要求的“做中国共产党的诤友挚友”，“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来转化调研成果，摈弃“老好人”“只报喜不报忧”的思想，同时也不夸张渲染、添油加醋。一切回避问题、回避矛盾、避重就轻的调查研究只会使参政党履职偏离正确轨道，不仅不能有效发扬民主，还会损害参政党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声誉。

三、调研务“求细”：详细规划、科学实施

习近平在《之江新语——调查研究要点面结合》一文中指出：“调查研究是一门致力于求真的学问，一种见诸实践的科学，也是一项讲求方法的艺术。”详细的规划是调研成功的基础。调研前、中、后期的工作都离不开规范性的设计。前期工作包括选择调研课题、组建调研团队、储备相关理论知识；中期工作包括制定调研计划、开展实地调研、组织研讨交流；后期工作包括撰写调研报告、转化调研成果、报送和宣传工作。每个步骤都需详尽考虑、周密安排。比如在组建调研团队时，要确保结构合理、分工得当。民革中央宣传部蔡永飞认为：“一是要有参政议政专家，善于从参政党的角度研究思考问题（通常指调研组带队领导）；二是要有科学研究专家，用以保证在科学性上不犯错误，并且引导调研组采用科学研究方法，提升调研组的研究能力；三是要有官员型专家，用以保证不犯政策性错误、增强政策上的针对性（通常应从与调研课题相关的职能部门邀请）；四是要有实际工作者（本党派代表性人士），用以强化民意基础；五是要有参政议政文稿写作专家，准备执笔起草调研报告。”^[7]

调研提纲的设计也至关重要，要在厘清调研核心目标的基础上，根据选题和实际情况精心设计调研线路、调研程序和问题清单，合理选择调研地点、访谈对象、参会人员等，不仅要提前了解当地基本情况，还可邀请经验丰富的调研“老手”，必要时开会集体论证调研提纲的可行性。一些临时改变调研路线的“自选动作”也应提前计划在内。

在调研过程中要做“细心人”。对所见所闻、所获所感要细致分析，既“沉进去，又钻出来”，把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发现问题、发现矛盾、发现本质，运用实证分析做到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最终不忘回归到参政党调研的根本目的上来。

习近平指出：“调查研究是做好领导工作的

一项基本功,调查研究能力是领导干部整体素质和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8]“调查研究的过程是领导干部提高认识能力、判断能力和工作能力的过程。”一名合格的参政党成员必然要经历由调查研究作为起点的历练过程。由于大部分参政党成员的本职工作可能并不依赖大量社会性、政策性调研,因此调查研究是一个在干中学、学中干的过程。新加入的参政党成员不应有畏难情绪,要勇于在实践中探索,经验丰富的骨干成员要发挥“传帮带”的作用,帮助新成员尽快掌握调研方法。

四、调研务“求准”:选题精准、言之有理

选题是参政党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的起点,选题的质量决定调研的质量。选题既要坚持原则,又要紧盯问题。

一是坚持“讲政治”原则。参政党的调研不同于西方反对党、在野党的调研,后者往往是为党争、票选服务的“为反对而反对”的调研,调查研究的攻击性甚于建设性。参政党调研的目的不是为了弱化、推翻执政党的领导,也不是为了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道路,而是立足维护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帮助执政党把各项工作做好,就像习近平指出的,参政党的调研是“帮助我们克服工作中的不足”。因此,必须坚持“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的政治定位,在调查研究全过程坚持“建设性”“团结性”“合作性”的政治原则,做到“帮忙而不添乱”“监督而不越位”“批评而不拆台”。

二是坚持问题导向。参政党调研不是“随心所欲”“兴趣导向”的调研,而是要紧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按照“参政参到要点上,议政议到关键处”的要求,突出“抓要害”“抓关节”,聚焦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社会各界普遍关注、基层群众极为关切的难点、痛点、堵点类问题。通过精准调研,为党委政府多提供“雪中送炭”“亡羊补牢”“画龙点睛”的对策建议,少做“锦上添花”和“事后诸葛亮”的工作。

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入了解群众需求,切实解决广大百姓关心关切的利益问题,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9]调研务“求准”要求参政党成员注重对理论知识和法律政策的学习、研究。理论的价值在于反映现实规律并指导实践。调查研究先要进行理论储备,理论扎实了,才能做到调研的“有的放矢”和“高屋建瓴”。用理论联系实际进行说理,才能做到“言之有理、言之有据”。同时,要明法律,懂政策。参政党调研一定要熟悉所涉及领域的现行政策和法律法规,否则就会说“外行话”、做“无用功”。现实中,有的参政党成员开展一些跨界别性调研,因为失去了专业性优势,加上没有认真掌握相关领域的法律政策,出现一些“雷人语录”或“无效调研”。因此,需在调研前充分“备课”,除了掌握法律政策,还要了解这一问题国内外学界研究的进展情况和代表性成果,熟悉政策、法律演进的历史脉络。功课做到位了,调研的精准性才有保证。

五、调研务“求效”:出实招、见实效

参政党调研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提出政策性意见建议,“出实招、见实效”指提出的对策建议应具备可操作性、针对性和时效性。所提对策,一是不能与现行法律规定和国家政策精神相抵触,不要与中央的大政方针和政策形势相逆反,不能对某一群体有歧视性倾向,不能违背公平和正义,这就要求调研者具备一定的政治敏感性和政策敏锐性;二是避免泛泛而谈、大而化之。不能只提一些指导性、理论性、原则性的“抽象”的思路却没有具体解决问题的措施、办法和抓手,使得调研成果沦为“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三是避免照搬照抄。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考虑空间、时间的特殊性,考虑区位地缘、经济基础、文化风俗等差异性,因地制宜;四是不能只看眼前,不顾长远。要运用系统的、发展的、联系的思维看问题。好的对策建议不仅要解决当下和表象的问题,更要统筹谋划长远,

解决深层次问题；五是尽量避免遗留问题或引发新的矛盾。以“根治”“治本”为上上之策，切勿顾此失彼，因对策不当引发新问题。“对策建议”是调查研究最具难度也最关键的环节，是成果产出的“最后一公里”，成败在此一举。

习近平指出：“对经过充分研究、比较成熟的调研成果，要及时上升为决策部署，转化为具体措施；对尚未研究透彻的调研成果，要更深入地听取意见，完善后再付诸实施；对已经形成举措、落实落地的，要及时跟踪评估，视情况调整优化。”^[10]因此，参政党对某个问题开展调查研究一定不能抱着“一锤子买卖”的心态，而是要长期跟踪、久久为功。要主动和政府部门加强联系，做好督办工作。要不断创新完善参政党的业绩考核与奖励制度，调动参政党广大成员开展调查研究的主动性、积极性。对所取得的成绩要积极进行宣传，扩大对上对下对外的影响力，提高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社会认可度。

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急剧变化，群众利益诉求更加多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依然突出，加之大国博弈白热化的背景，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参政党要以更强的政治自觉和历史主动，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征程上，以更加坚定的行动对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展开调查研究，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领会其中的道理、哲理、学理，接续“传家宝”，苦练“基本功”，“坚持眼睛向下、脚步向下，了解基层群众所思、所想、所盼，

使改革更接地气”^[11]。

【参考文献】

- [1] 杨学博，孔祥武，宋静思，等. “掌握调查研究这个基本功”，总书记这样言传身教 [N]. 人民日报，2023-04-23 (01).
- [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习近平关于调查研究论述摘编 [G]. 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8.
- [3]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EB/OL]. 共产党员网. <https://www.12371.cn/2019/03/01/ARTI1551446299677980.shtml>.
- [4] [7] 蔡永飞. 新时代参政党调研工作及其基本规范探析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6）：98.
- [5]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 [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526.
- [6] 廉思. 蹲点调研：基本特征与实践要点 [J]. 人民论坛，2023（11）：21.
- [8] 习近平. 谈谈调查研究 [N]. 学习时报，2011-11-21（01）.
- [9] 习近平在河北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 [EB/OL]. 共产党员网. <https://www.12371.cn/2023/05/12/ARTI1683900790749321.shtml>.
- [10] 习近平调查研究“五字诀” [EB/OL]. 光明网.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62795843951700050&wfr=spider&for=pc>.
- [11]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一次会议 [EB/OL]. 共产党员网. <https://news.12371.cn/2016/02/23/ARTI1456231106586609.shtml>.

责任编辑：刘悦

当前形势下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汪 锐

(中共西安市委党校 陕西 西安 710054)

摘 要: 有效提高参政议政能力,是增强民主党派履职能力的核心任务,也是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的必然要求。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职能提升路径包括:聚焦议政主题,优化参政议政的科学性;加强调查研究,夯实参政议政的实践性;认真分析研究,突出参政议政的针对性;重视成果转化,提升参政议政的有效性。

关键词: 治理现代化 民主党派 参政议政

中图分类号: D6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218 (2025) 02-0042-06

做好参政议政工作,是民主党派的重要职能和中心任务,也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发挥的重要形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断提高参政议政能力和水平,参政参到要点上,议政议到关键处,为政党协商深入开展打下坚实基础。”^[1]这对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明确了任务。新征程上,有效提高参政议政能力,是增强民主党派履职能力的核心任务,也是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的必然要求。

参政议政是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重要问题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反映社情民意,进行协商讨论,并通过调研报告、提案、建议案或

其他形式,向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提出意见和建议。选题、调查、撰写、成果转化是参政议政的重要环节和核心内容。有效提立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能力,离不开对参政议政机制的完善,需要构筑开放的参政议政工作平台,整合党内外优秀人才资源和优质信息资源,把民主党派作为政党的组织优势和整体优势真正发挥出来。需不断完善制度保障和机制,如专题调研制度、中央联系地方组织的成果征选和社情民意信息报送制度、专委会参政议政制度和联系政府部门制度,以及参政议政骨干队伍建设机制、信息收集及建议反馈机制、集体讨论和科学论证机制、参政议政工作保障机制和参政议政激励机制等。主要可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收稿日期: 2025-01-15

基金项目: 陕西省“十四五”教学科学规划2024年度课题“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政治制度自信提升路径研究”(SGH24Y2512);西安市委党校2024年校级课题“民主党派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参政议政能力提升研究”(2024XYB0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汪锐,女,中共西安市委党校统战理论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统战理论。

一、聚焦议政主题，优化参政议政的科学性

提案、议案、调研报告和信息工作等是提立参政议政能力的基础，如何有效聚焦议政主题，提升选题的科学性，是亟待破解的首要任务。

（一）选题方向要突出前瞻性

选题要胸怀“国之大者”。2020年4月习近平陕西考察之后，“国之大者”成为治国理政部署中反复强调的概念。“国之大者”涉及政党和国家的基本方向、基本立场、基本利益、基本道路，事关全局、事关根本、事关未来、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关乎党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使命、方向、格局和战略，具有全局性、根本性、长远性意义。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是科学决策的首要原则，也是讲政治的根本要求。同时，紧扣大局履职也是民主党派的章程中所规定的。在当前目标任务下，议政选题要围绕党的二十大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有关部署和落实展开，围绕地方发展中的难点、堵点和痛点切入，围绕群众关切的民生领域等方面来甄选。

选题要立足眼前、心怀长远。民主党派议政选题作为参与科学决策的前置性环节，要求选题做到眼前相关性和长远性的有机统一，不顾眼前会失去政策实施的立足点，不顾长远会失去政策实施的延续性。九三学社中央提交的《关于把握机遇，走中国特色低碳发展道路的提案》被列为全国政协会议的大会“一号提案”；2022年九三学社中央就“加快绿色低碳科技创新，助力‘双碳’目标实现”进行重点考察调研，把全球气候变化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影响作为参政议政的长期课题常抓不懈，在锚定选题并持续关注过程中，真正实现了议政选题立足眼前和心怀长远的有机结合。

（二）选题聚焦要突出紧迫性

选题要聚焦重点关键领域。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民主党派要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任务，在议政选题时要注重紧迫性，做好解疑释惑的工作、起到凝聚共

识的作用。比如农工党利用自身界别优势，聚焦关键问题，针对中国疫情防控的难点和重点，在《关于完善我国新冠疫情防控策略的提案》中提出加强农村地区疫情防控措施的层层推进，做好疫情防控措施“最后一公里”的精准落地等举措，为疫情防控的关键环节提供了有效对策。这样的议政提案既发挥了党派界别优势，又聚焦了时势任务下的重点关键领域，也提升了民主党派职能发挥的效力。

议政要着重聚焦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参政党议政的关键是必须关注和回应群众最关切的热点问题。解决好就业问题始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任务，台盟中央就将“坚持实施就业优先政策”作为年度重点调研课题选题。在2022年8月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台盟中央领导针对就业重要议题进行发言，对如何更好依法解决灵活就业者劳动纠纷、缓解大学毕业生就业心理压力等问题作出科学分析并提出有效举措，回应了群众关切的热点问题，有力提升了参政议政的影响力。

（三）议政方案要突出可行性

参政议政选题的出发点是发现问题并提供方案优化的政策建议，在选好议题后，如何科学准确找出切入点尤为重要。在当前信息化程度高、影响因素复杂的背景下，切入点的科学选择意味着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之所在。在参政议政过程中，必须选择具有关键制约和影响作用的问题进行科学研究、深度剖析。例如，民建中央在提交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集体提案中发挥自身界别优势，把议政的切口聚焦于民营经济，就如何促进我国民营经济发展，从政商关系、营商环境、税费、融资等方面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既回应了国家关切，又把握了关键切口，客观指出当前存在问题、提出针对性解决建议，以激发中小微企业活力，支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这一提

案受到广泛关注和重点督办,取得了良好效果。

“壹引其纲,万目皆张。”以问题为导向,切中要害,抓住关键,提出对策,是议题实施的落脚点。需要在纷繁的研判中找出最关键、最要害和最有效的举措,分主次、辨真伪、剖矛盾、理关系。民生工作是涉及面广、影响因素复杂的系统工程。例如,民盟中央在近些年的参政议政中有一条逐渐清晰的主线贯穿其中,就是改善和保障民生工作。“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要求……目前消除差异、推进均等化,是最大任务所在,同时,也是最大问题、最大困难所在。”这也是民盟中央“统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共同富裕”大调研的初衷。以持续关注来聚焦问题,以问题导向来解决问题,民盟中央连续多年将“民生问题”以党派提案名义建言献策,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等关键问题为突破,取得了较好效果。

二、加强调查研究,夯实参政议政的实践性

中共中央办公厅于2023年3月印发的《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为调查研究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具体遵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用好和做好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同样是民主党派发挥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作用的重要体现。科学、全面、客观、公正的调研是提供决策的前置环节,加强调查研究有利于夯实参政议政的重要基础,多年来民主党派若干重大参政议政成果,都是在科学扎实的调研基础上形成的。民主党派要加强调查研究,就要从优化调研基础、丰富调研方式方法、增强调研效果上持续下功夫。

(一) 全要素发力打牢调研基础

发挥党派组织优势,动员专业人才力量。发挥整体优势是民主党派体现政党属性、胜任参政党角色的客观需要。民主党派具有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特点,在调查研究中其要立足全体党派成员,充分依托各党派自身的专业优势和人才优

势,提升调查研究参与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发挥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在党派成员中,要重视对两类人才的分析和使用,一类是民主党派在界别特色基础上形成的优势领域人才。界别特色是历史孕育并形成的,体现了党派的鲜明特色和不可替代性。这类党派人员的参与,可以更加集中精力、发挥长处、体现优势,他们提出的政策建议更有针对性,更利于党派之间的优势互补,有效避免党派之间围绕热点问题形成低水平的重复调研。另外一类是在某一时期内就特定问题持续关注的专业优势领域党派人才,他们对很多热点难点问题的持续关注为形成有影响力的政策建议提供了基础。如芯片产业规划、数字经济等专业性强、科级含量高的领域,受到一批资深党派专业人士的深度关注,他们是调研参与的生力军,把他们有组织地吸纳进来,有助于为提升参政议政水平提供人才保障。

强化党派机关工作建设,提高调查研究的高度重视程度。民主党派机关建设是提高参政党履职能力的重要组织保证。加强参政议政调研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要求机关的领导班子成员要带头做好调研工作,树立求真务实、科学严谨的工作作风,把深入调研作为履职能力建设的基础要求,带头深入一线,查找问题根源,切中问题要害,找对问题关键,为进一步科学提出对策提供重要参考依据。二是建立健全专门的参政议政职能机构,如参政议政处、调研处等,吸收和组织有较强的参政议政能力的党派成员参与,撰写提案和调研报告等。三是作为民主党派机关,要继承党派优良传统,防止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真正深入基层,做好服务,通过机关的纽带和连接作用,充分调动党派成员调查研究、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党派优势和力量。

(二) 扎实做好调查研究的配套保障工作

做实做强基础性研究并进行持续跟踪。调查研究不仅包括实地调研,也包括基础性研究和持续性动态关注。只有将基础研究作为调研的基

石,才可以使参政议政和建言献策具有厚重底蕴,只有将持续性关注作为调研的依托,才可以使参政议政和建言献策具有深刻见解。要通过基础、要素、现状及典型案例等相关研究,广泛收集和掌握国内外相关领域的基本情况,对若干重大战略问题进行持续关注,并结合当前形势发展给出有效建议。

优化提升党派骨干成员的参政议政培训成效。很多党派骨干成员在某些专业领域具有较高素养,但却缺乏将专业问题转化为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的履职能力。这就要求增强社会主义学院等单位的培训针对性和有效性,以提升党派成员履职尽责和建言献策的能力为需求,邀请优秀代表人士进行经验交流和方法传授,同时增加党派骨干成员的实践锻炼机会,如提供政府实职或者挂职锻炼的机会,让他们在实际工作中积累经验,增强使命感,提升参政议政水平。

进一步加强调研所需的物力、资金保障。调查研究是系统工程,既需要调研人员的选择、也需要调研场所的甄选、物质的提供、经费的支持、信息的保障和制度的依托等。在地方层面,要给予参政议政工作专项资金保障,并且根据党和政府关切的要点、难点及相关进展进行科学预算,为参政议政活动的开展创造机会、搭建平台,为参政议政提质增效创造条件。

(三) 丰富调研方式,提升参政议政效能

有效统筹多种调研方式。发挥整体优势,将预调研、重点考察调研、联合调研、委托调研、自主调研等方式有机统筹,形成合力,提升参政议政的效能。受中共中央委托开展的民主党派重点考察调研,作为各民主党派履行参政党职能、开展调查研究和履职建言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建言献策的重要活动,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运行过程中的一项机制创新。在以往实践中,各民主党派就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开展重点考察调研,并将调研成果以书面形式通过“直通车”上报,

在得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重视和批示后,许多建议被有关部门列入重要议程并采纳。进一步发挥重点考察调研的顶层设计优势,推进中央和地方联合调研,加强沟通联系和统筹协调,有助于进一步提升调研成果质量。

用好大数据,充分运用互联网等新型参政议政方式。建立并完善“互联网+参政议政”网络平台工作机制,让民主党派成员都有平台、有机会、有信心参政议政,充分调动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使其参政议政热情得到积极发挥。同时要利用好大数据技术和新的通信网络手段,搭建好信息工作平台,如微信、钉钉等工具软件,建立“互联网+参政议政”工作机制,创新性开展工作,提升参政议政效能。

加强智库建设。以智库建设为载体,以统筹资源为抓手,以提供决策建议为支持,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近年来,民主党派探索和加强在整合党派资源基础上的开放平台建设,以智库为载体和平台吸取党派外的有效资源和智慧力量,提高建言献策的组织能力和整体水平。如2008年民进中央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合作中心的成立,开创了党派中央和地方智库合作的先河,此后九三学社、农工党、民革等党派中央也都先后建立了和智库合作的机制,在若干决策领域为国家重大战略决策和地方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智力支持。

三、认真分析研究,突出参政议政的针对性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民主党派在参政议政中,需要立足中国的国情思考和解决问题,既关注主题的时代性、也剖析问题的客观性、同时突出解决问题的可行性。在议案、提案、调研报告、意见建议的撰写中,要规范扎实撰写,突出参政议政的针对性。

(一) 聚焦主题要坚持问题导向

在议案、提案、调研报告、意见建议的撰

写中,聚焦主题要坚持问题导向,主要立足三个方面。

首先,具备提出关键问题的视角。撰写提出的问题必须立足人民利益和国家立场,思考问题必须坚持科学观点、理性认知和先进思路。在撰写找出问题时,要直面问题、不回避矛盾,不能蜻蜓点水式表态、更不能绕开问题唱高调,同时要发挥民主党派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发挥共产党“诤友”的作用,拿出有分量的成果,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其次,突出解决问题的优势和路径。中国共产党的人民利益代表性与民主党派的界别联系性,能够最大化地包容、吸纳各种有序的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形成共同致力于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共识和行动共识。在撰写议案、提案、调研报告、意见建议时,要突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找出存在的问题、潜伏的矛盾和可能的危害,尽可能化解重大问题,解决中小问题,防范可能出现的问题,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增加安全性和稳定性。

最后,具备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民主党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其在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独特作用,在撰写内容中发挥界别优势,在提出对策建议中发挥党派优势,更有利于参政议政成果转化,从而形成较为完善的运行闭环,更好地发挥党派的特点和优势。

(二) 分析问题要坚持系统观念

坚持系统观念就是要把分析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放在有机整体中考虑和处理,在撰写分析问题主要处理好三组关系。

首先,处理好整体性和协同性的关系。整体性指向问题的全局性和战略性,协同性指向局部性和部署性。在政策实施的布局上,要考虑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市场与政府等关系,相互之间统筹协调不偏废,防止因碎片化和片面化地提出措施影响整体功能,对策要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

其次,处理好现实性和可能性的关系。现实性是指当前已具备的客观条件,可能性是指通过创造条件可以达到的状态。对策的提出一定是基于破除机制障碍、根除制约因素、改善相关要素后的更优化的选择和方案,是未来努力的主要发力点。

最后,处理好体制优势和自身优势的关系。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是可以统筹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民主党派的优势是智力密集、组织有力,可以有序把政治参与诉求有效地输入政党制度的运行中,提出可实施方案并转化为发展动力,同时可将民主党派人士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来。

(三) 提出对策要坚持守正创新

撰写议案、提案、调研报告、意见建议的目的是提出守正创新的对策和建议,守正是指坚持马克思重要立场、观点方法,创新是指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调整和完善,具体需要把握好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原则。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民主党派在给出建言资政意见时要坚定政治立场,在为谁建言、建什么言等原则问题上,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需要出发,以中共中央的大政方针为大局,致力于大政方针的贯彻落实,致力于用大政方针凝心聚力^[2]。同时要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并将依法治国的思路贯穿于对策实施中,真正达到三者的有机统一。

其次,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成果的灵魂。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过程,就是实事求是参与中国政党制度实践的过程。给出对策建议时既要直面问题,也要立足中国实际,考虑社会发展的实际阶段,给出具有操作性和可行性的建议,从而提高建言资政的转化率奠定良好的资政基础。同时要结合文体、格式、要求规范准确呈现撰写内容。

最后,重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优势发挥。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民主党派做好议政成果撰写的过程,也是协助党和政府答疑解惑、化解问题、凝聚共识的过程,更是人民民主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践中的充分体现。给出的对策建议要既能反映民主协商的内涵,也能展现民主决策的意义,从而真正展示出民主党派职能发挥的功能和价值。

四、重视成果转化,提升参政议政的有效性

2023年1月,习近平在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座谈并共迎新春时指出,希望各民主党派把多党合作所长与中心大局所需结合起来,在参政议政中聚众智,在民主监督中建诤言,在政党协商中献良策。提高参政议政能力的重要环节,就是要有效激活和增进参政议政的成果转化,加强上下联动、左右互通,从中央与地方、政策执行与政策影响力层面,提升民主党派职能发挥的综合效能。

(一)从民主党派中央层面,把握参政议政成果的关键点,提高党和国家决策层与民主党派中央的互动

国家决策涉及从启动到落实、从主题到问题,从源头到结尾的一系列程序、方式、方法等。无论是对国家治理能力的必要性,还是对政策实施科学性的考量,都需要民主党派的积极参与。从民主党派中央层面,尤其迫切需提高国家决策层与民主党派中央的互动。首先,民主党派要紧密把握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导向,针对当前热点难点问题汇总、社情民意焦点等问题,集中力量各个突破,提升合力效果。其次,民主党派中央要不断加强与有关国家部委和专家学者的联系,广泛听取意见建议,为开展调研、协商建言提供有力支撑。党派成员要敢于表态,积极贡献真知灼见,围绕主题多谈一些实际情况和工作体会,多提供一些关键数据和真实案例,提升参政议政工作

水平,共同助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另外,民主党派中央要抓住信息捕获的敏感性、发挥信息反映的迅速性、把握议题提出的科学性、提高问题剖析的针对性、加强政策实施的可操作性,增强参政议政实际效能感。最后,拓宽民主党派中央层面知情明政的渠道。结合国际国内局势动态,要从多方位知晓和获取信息,及时掌握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同时要丰富制度化、日常化的沟通路径,让民主党派及时了解执政党和政府的议程重点和动向,更好地为参政议政提供客观知情条件。

(二)从民主党派地方层面,有效发挥民主党派各级专委会的资政和智库作用

从民主党派机构设置来讲,专门委员会是民主党派的智囊机构,由不同领域的专业性人员组成,发挥着信息收集、整合、分析、咨询和转化的重要作用,其专业化分工优势可以提高政策实施建议的科学性和针对性。首先,提高组织动员能力。发挥各个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和个体参与专委会职能发挥的积极性,建立具有界别优势的智库,将个人能力与家国情怀、党派使命相结合,真正发挥从个体到组织,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的整合功能。其次,建立民主党派成员参政议政的有效激励机制。要把认真尽责履职的党员和不合格的党员有效区分开来,把参政议政有效成果转化体现于评优和使用民主党派成员,如奖励议政成果、提供科研经费、计入本职工作考核权重等方面,从实效上激发参政议政热情。

(三)从政策执行层面,建立参政议政成果的反馈系统

要建立参政议政成果的反馈系统,有效推动、紧密跟进,激发民主党派成员参政议政的热情。首先,建立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反馈系统,搭建互联网+大数据平台,尤其在政策制定、实施、执行的过程中加强反馈,对于民主党派的提案、议案要有跟踪、有回应。其次,在公共政策

输入的后续环节,要切实回应民主党派的议案和提案,减少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不能重表态轻落实。应疏通后续进展渠道,以便进一步完善建议和对策,为持续研究积累科学经验。最后,建立包括反馈结果考核指标评价体系,要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者把反馈纳入考核指标体系内,提高决策实施的科学性、公开性和实效性。

(四) 从政策影响力层面,增强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媒体传播与互动

民主党派在参政议政过程中,要用实际工作成效彰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越性和独特性;基于自身积极的政治参与活动和社会实践,增强同群众的联系;利用媒体资源进行广泛宣传,提高社会认同度,扩大社会影响,夯实参政议政的社会基础。

增强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媒体互动,综合运用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多渠道实时跟踪报道中央和地方参政党参政议政能力情况。有效宣传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考察调研,扩大社会

公众知晓度,讲好中国故事,讲好新型政党制度故事,形成全社会支持和认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良好社会氛围。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围绕重大政策制定和重大战略实施,提出千余条意见建议,一批重要建议已转化为党和国家的决策。

立足新的历史方位,要强化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职能,加强其履职能力提升,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不断增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和效能。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向党外人士致以新春祝福 要想登上高峰必须不断攀登 [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5-02-13.
- [2] 加强履职能力建设 提高履职尽责效能: 民进中央 2019 年参政议政年会综述 [N]. 团结报, 2019-12-10.

责任编辑: 刘悦

在坚持“两个结合”中传承发扬照金精神

李倩

(中共铜川市委党校 陕西 铜川 727031)

摘要：照金精神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领导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以及此后的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艰难斗争中培育形成和发扬光大的伟大精神，是革命英烈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被列入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照金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陕甘革命实际相结合这一伟大实践的智慧结晶，其以中华文明为源头活水，实现了民族精神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照金精神 “两个结合” 传承发扬

中图分类号：D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218 (2025) 02-0054-06

2015年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省铜川市照金镇考察时指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强调“要加强对革命根据地历史的研究，总结历史经验，更好发扬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把照金精神传承好发扬好”。照金精神的科学内涵是：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顽强斗争的英雄气概、扎根群众的工作作风。我们要把照金精神传承好发扬好，持之以恒地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汇聚磅礴精神力量。

一、照金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生动体现

照金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陕甘革命斗争实际相结合这一宏伟实践的

智慧结晶。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传播启蒙了思想、培养了骨干、提供了智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夯实了文化沃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英勇斗争实践共同孕育了照金精神。

(一) 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传播为照金精神的孕育提供了理论基石

陕甘地区偏居西北一隅，长期以来地广人稀，经济文化落后，优秀的外来文明很难引入。五四运动爆发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迅速传播，陕西成为较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省份^[1]。陕西籍学生创办的《秦钟》《共进》等刊物宣传了新文化、新思想，唤起了陕西人民的革命自觉性。刘天章、李子洲、魏野畴等革命先进分子回到家乡，以课堂为阵地宣传革命思想培养革命骨干。刘志丹是在榆林中学求学接受马克思主义并

收稿日期：2025-01-15

基金项目：2024年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专项青年项目“照金精神及其时代价值研究”（2024QN35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倩，女，中共铜川市委党校党建部副教授，研究方向：党史、党建。

走上革命道路的，谢子长早年投身新文化运动，在著名教育家杜斌丞和李子洲的影响帮助下，对马列主义思想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习仲勋在三师求学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投身了革命。照金精神是在马克思主义同驱逐当地军阀势力斗争紧密结合、同建立革命组织紧密结合、同陕西的社会实际紧密结合中孕育发芽的。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为照金精神生成提供了文化根基

陕西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丰富的文化遗存、深厚的文化积淀，为照金精神的形成提供了文化沃土。刘志丹幼年时在祖父办的私塾读书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目睹了反动政权和地主豪绅对父老乡亲的残害践踏，立志“改造社会、救国救民”^[2]。青年时期就写下了“看长城内外破碎，重收拾有待吾辈”的壮丽诗篇，并为之奋斗到底。处于启蒙时期的习仲勋被《三国演义》《水浒传》《隋唐演义》等小说中侠肝义胆的英雄形象深深吸引，养成了他睿智、豪爽、勇敢、坚毅的品格，虽几经坎坷，身处逆境^[3]，但百折不挠，奋斗不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为照金精神的生成提供了文化根基。

（三）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为照金精神形成提供了实践基础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作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根据地创建者历遭险阻、几经起伏，多次被捕入狱、身负重伤，但他们百折不回、垮了再来、再垮再来，“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3]是他们身上的忠诚本色。从组建游击队到成立正式红军，数次几乎全军覆没但从不灰心，他们“以斗争求团结”，陕甘红军发展壮大。成立革命委员会建立民主政权、分粮分田解救劳苦大众、开展贸易集市活跃边区经济，一系列举措让共产党人在群众中扎下了根，根据地得以存活发展壮大。照金精神就是在陕甘

边革命根据地艰难曲折的斗争实践中得以孕育产生并不断丰富发展的。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照金精神的源头活水

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和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的精神标识。在开创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过程中陕甘共产党人展现的忠诚于党、顾全大局、信念坚定、不怕牺牲、顽强斗争、扎根群众等优秀品质和精神风貌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体现。照金精神以中华文明为源头活水，实现了民族精神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一）“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传承了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情怀

在长期繁衍生息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爱国是“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忧心，是“寸寸山河寸寸金”为国献身的决心，是“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衷心，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舒心。从“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到“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从“拼死也要拿下大油田”到“清澈的爱，只为中国”，无数中华儿女用汗水、热血、生命表达了对祖国最深沉的爱。

《爱国歌》是刘志丹1924年在榆林中学就读时写的一首诗词，“快，内惩国贼，外抗强权，救我中华万万年”的怒吼指引他从一个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成长为一个具有坚定信仰的共产党员，东征前刘志丹对夫人同桂荣最后说的话：“我这次上前线，是再次去为我的信念而奋斗，又一次表白我对国家、对人民、对党的忠诚，为救国救民我可以贡献出一切。”“一生为人民创造红地，百姓到如今叫你青天”这幅挽联正是谢子长光辉一生的写照。“不改变这贫富不公的世道，我誓不还家”，李妙斋用生命书写

了对革命事业的忠诚。起义失败王泰吉豪气冲天：“男儿当以身贡献社会，生死利害，在所不计。”刘林圃临刑前高呼“共产党是斩不尽杀不绝的”。陕甘共产党人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爱国主义精神，并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对党的无限忠诚对革命胜利的无比坚定。

（二）“顽强斗争的英雄气概”彰显了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斗争精神

斗争精神是中华民族世代传承的优秀基因，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盘古开天地从此宇宙不再混沌，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这些神话故事生动展现了中华民族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品质。从屈子投江到苏武牧羊、从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到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一大批仁人志士塑造了自强不息、坚韧不拔、舍生忘死的民族性格。敢于斗争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风骨，从“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豪情壮志到“天翻地覆慨而慷”纵情欢呼，再到“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精神，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斗争史、抗争史。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在斗争中发展壮大的，刘志丹说：“我们只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只靠笔杆子不行。没有武装的革命是不会成功的，谁和你一翻脸，叫你滚就得滚。”^[4]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和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理论，从清涧起义、渭华起义到两当兵变，从陕甘游击队到红二十六军诞生，陕甘共产党人用“枪杆子”开创了北方第一块山区革命根据地。陕甘共产党人是善于斗争的，建立革命武装时提出红白灰“三色理论”，坚持既发展自己（红）又要转变土匪（灰）、策反敌人（白）的原则。选择敌人鞭长莫及的山区开展活动，“梢林主义”是创造根据地的马列主义。采用“狡兔三窟”式多区域战略布局，被毛泽东赞赏为“创出局面，这很高明”^[5]；陈家坡会议上提出的“不打大仗

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展现了高超的斗争策略。“顽强斗争的英雄气概”彰显了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斗争精神，谱写了陕甘共产党人不怕牺牲、英勇顽强的英雄赞歌，是照金精神的精髓。

（三）“扎根群众的工作作风”秉持了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政治思想。从《尚书》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到《晏子春秋》的“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为本也”，从孔子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到孟子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展现了古代传统文化中的民在思想。中国的民本思想彰显的是“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的崇高境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情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无私坦荡。

陕甘共产党人继承践行了“民为邦本”思想，刘志丹将“生而益民、死而谢民”作为一生追求，他每到一地就会深入群众之中了解群众生活，关心群众的疾苦，为群众申冤除害。在刘志丹带领队伍进入神木、府谷地区的时候，队伍被沿途赶到的老百姓围得水泄不通。红二十六军政委宋任穷说：“当地的老百姓都亲切地称他叫‘老刘’。”有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大娘挤到了刘志丹的跟前，用颤抖的手将刘志丹从头到脚地抚摸了一遍，然后她又从脚到头地抚摸了一遍，激动地说道：“老刘啊，我终于知道你长啥样了，我们老百姓就都指望你了啊！”谢子长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们都是老百姓的儿子，如果随意打骂、欺负百姓，那么我和强盗又有什么区别，肯定逃不过失败的结局。”当年照金流传一首歌谣“升子借粮，斗子还粮，照金百姓心凉凉，打破升斗，分到土地，红军的队伍向太阳”，生动再现了陕甘红军爱民亲民的形象。习仲勋常说：“没有群众的支持，就没有我们的一切。”照金革命根据地陷落后主力红军向南梁地

区转移，习仲勋仍留在照金地区是因为“他有群众基础，白天藏入树林，晚上出来坚持做群众工作”，习仲勋始终奔走在三秦大地上，始终走在群众中间。当群众有疑难时，就说“找仲勋去”。1942年的一份组织鉴定称赞他是“党的宝贵的群众领袖”。“扎根群众的工作作风”秉持了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展现了陕甘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本色，是照金精神的特质。

三、传承照金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新篇章

照金精神是“两个结合”的生动体现和智慧结晶，是老一辈革命家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习近平指出：“照金精神在现在还是很适用的，要把照金精神传承好发扬好。”过去，照金精神是引领革命走向胜利的灯塔，今天，照金精神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强大精神动力。

（一）始终坚持“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的坚定信念

“党的利益在第一位”是毛泽东主席为习仲勋亲笔书写的题词，也是对陕甘边根据地创建者的最高褒扬。刘志丹在入党申请书上写下铮铮誓言：“加入党，就要为共产主义信仰奋斗到底。作为个人来说，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死。”谢子长在入党宣誓词豪情万丈：“我把一切都交给党了，我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习仲勋始终怀着“最大的牺牲决心”，15岁在监狱里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定地认为“是共产党好，反正要跟他到底”。他们“知有党不知有身”，从未动摇过对党的坚定信心、对革命的必胜信念，始终对党绝对忠诚、顾全大局。精神的力量穿越时空，“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诠释了铜川矿工对党和国家最深沉的爱；“人生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不把党的阳光送到群众手里，我死不瞑目”道出了实践“三个代表”典

范郭秀明的赤子之心，一代代共产党人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传承照金精神，要坚持不懈用照金精神滋养初心、淬炼灵魂，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二）继续发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顽强品格

陕甘地区位于西北一隅，经济发展落后、军阀割据混战、自然灾害频发、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以满腔热血和无限英勇投入到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他们历经七十余次起义失败而不气馁，数次近乎全军覆没而不灰心，身陷牢狱之苦、生死之忧而不屈服，凭的就是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靠的就是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例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国家工业建设需要煤炭时，一大批支援大西北的产业工人从祖国四面八方扎根铜川，他们唱支山歌给党听，高呼“活着干，死了算”，在百里煤海、千尺井下的埋头苦干，不仅开采出了物质财富，更开采出了艰苦奉献、乐观向上、包容开放、创新奋进的矿工精神，生动体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斗争精神。进入新时期，随着资源枯竭危机和“卫星上看不到的城市”引发的环境问题，倒逼铜川走上了转型之路，发扬斗争精神，在高质量全面转型发展之路上跑出加速度。这片土地的人民革命战争年代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自力更生、发愤图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其以顽强的革命意志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彰显了共产党人的斗争精神。

传承照金精神，要拥有敢于斗争的底气，要具备善于斗争的智慧。要主动应变局开新局。例如，铜川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主动融入陕西省内陆开放高地建设，聚焦“三个年”活动落地建设一批投资体量大、技术含量高、带动能力

强的产业项目；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乡亲们的事情办好”，既量力而行办好“民生工程”又尽力而为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三）牢牢坚守“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的政治立场

1999年习仲勋在天安门上观礼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典时这样感慨：“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不仅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心声，也是人民的心声，是古今中外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英雄群体塑造了“扎根群众的工作作风”。刘志丹参加革命后说，“我要使全中国人民都过上好生活”，无论走到哪家老乡的窑洞里，他都是往墙根下一蹲，和老乡摆情况、拉家常。谢子长告诫同志们：“我们的一切活动都要为着人民群众的这一根本利益。”在生命弥留之际，他仍不忘人民，流着眼泪说：“就这样死了，我对不起老百姓，我给他们做的事太少了！”习仲勋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以“做人民的忠实勤务员”为己任。因为有合民心、顺民意的群众工作方法，因为把建立人民政权、维护群众利益作为革命目的，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始终和群众融为一体，陕甘共产党人将初心与使命书写在陕甘大地的山山峁峁。

传承照金精神，就是要站在老百姓这一边，践行正确政绩观。既谋划实施好治水兴水、助农兴农、上学就医的大事要事，又用心解决好背街小巷、物业管理、垃圾分类等群众身边的烦心琐事，努力把惠民生的事办实、暖民心的事办细，让老百姓的生活更美好、幸福感更强。

【参考文献】

- [1] 陈永恭，秦生. 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史 [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7.
- [2] 习仲勋. 难忘的教诲：纪念刘志丹同志九十诞辰 [N]. 人民日报，1993-10-24.
- [3] 刘力贞，张光. 纪念刘志丹（内部资料）[M]. 1998：198.
- [4] 中共铜川市委，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照金革命史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4.
- [5]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王晓璿

“讲信修睦”的历史意蕴与当代价值

陈祎舒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陕西行政学院] 西安 710061)

摘要:“讲信修睦”最初见于《礼记·礼运》篇。随着经典的阐释,“讲信修睦”逐渐由描绘人与人之间诚信和睦的关系衍生出形容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而维系这种友好关系的前提在于双方地位的平等。“讲信修睦”既蕴含着儒家礼治的思想,同时也在传播过程中逐渐融入古代法律乃至风俗之中。中国共产党对于“讲信修睦”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体现于建设国家公共秩序以及成就人类命运共同体两个方面。就时代,“讲信修睦”思想具有了来自个人、社会与国家三个维度的新的价值。

关键词:“讲信修睦” 历史意蕴 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 G122; D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218 (2025) 01-0051-06

一、“讲信修睦”思想的历史意蕴

“讲信修睦”最初见于儒家经典《礼记》之《礼运》篇。在《礼运》篇中,“讲信修睦”是用来描述三代之际的大同之世,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原文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1]孔颖达《礼记正义》疏云:“‘讲信修睦’者,讲,谈说也;信,不欺也;修,习;睦,亲也。世淳无欺,谈说辄有信也。”^[2]张岱年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大辞典》作出了如下的解释:“意谓尧舜盛世,大道之行,不以天下之大私其子孙,而天下之圣贤公共之,是时所讲习者诚信,所修为者和睦。反映了儒家对尧舜禹时代道德风尚的美化和向往,并转化为伦理规范加以提倡。”^[3]而根据《礼记·礼运》作者的描述,在讲信修睦的人类社会图景

中,个人不再独亲其亲,独子其子,而老人与鳏寡残疾者则皆有所养,壮年有所用,幼年有所长,男女都有自己的社会分工。在这样的一种近乎完美社会之中,财产不再被据为私有,而是得到了最为合理的利用,人们也能够自觉从事生产劳动。至于盗窃等非法行为则彻底不见踪影,家家得以夜不闭户,这样的社会即被称为大同之世。

可见,就这一词汇的本意而言,是从诚信与和睦两个方面来描绘大同之世中人与人之间的理想关系。同时,《礼运》篇的作者还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指出了人与人之间维持讲信修睦这一关系的必要性,以及实现讲信修睦的唯一途径,即实行礼治。《礼记·礼运》的作者将人类不学而能的本能情感概括为喜、怒、哀、惧、爱、恶、欲

收稿日期: 2025-01-15

基金项目: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陕西行政学院)2023年度校级课题“‘讲信修睦’思想视域下的和谐社会与大国外交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陈祎舒,男,中共陕西省委党校(陕西行政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儒学、伦理学。

七者，称之为“七情”，与之对应的是后天修习而成的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称之为“十义”。人与人之间的讲信修睦称之为利，争夺相杀则称之为患，为了达到趋利避患的目的，作为大同之世的治理者，圣人以道德教化作为控制人类原始本能的关键，具体言之则是推行礼治：“故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4]礼作为一种起源于早期人类的祭祀仪式，进而发展成为一种具有一定尊卑等级的社会秩序，起到了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在孔子看来，正是周公基于夏商礼仪制度下的“制礼作乐”，奠定了周王朝一度的繁荣与稳定，故孔子言：“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并且一生都以恢复周代礼制自任。《礼运》之中将作为生理本能的“情”与道德伦理的“义”并举，从“饮食男女”与“死亡贫苦”正反两方面肯定了人之“欲恶”的存在，将人的这种“欲恶”来源归之于心，并指出礼的作用一方面在于规范人的情感与欲望，避免了人与人之间在资源上的相互争夺之弊；另一方面，则发扬了孔子“正名”的思想，将社会中不同身份等级的人皆置于礼的观照之下，为人们对“义”的行为的落实提供一套可靠的依据。也正是借助礼对于情感欲望的限制以及道德行为的规范，最终得以实现人际交往之间的讲信修睦。而根据“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5]，我们不难看出，“讲信修睦”的结果在于促成社会和谐，而个人的良性发展始终不能脱离这种和谐的社会氛围而独立达成，因此讲信修睦不仅具有利他性，就生活在社会整体中的每一个个体而言，“讲信修睦”也是保障自身利益的必要条件，显示了个体与社会的利益趋同性，因而具有利己性的一面。

“讲信修睦”虽最初用以说明人际关系之间的和谐状态，但在历代学人对于经典阐释的过程中，也将这一词汇用于形容两国国君之间的和谐关系。如宋人鲍彪《战国策》注云：“两君相

遇，则讲信修睦，故遇者，相好也。”^[6]进而引申成为形容国与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如理学家程颐在《程氏经说》中解《春秋》“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来”言：“邻国之交，讲信修睦可也，安用盟为？公屈己与臣盟，义非安也。”^[7]如此一来，原先作为描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讲信修睦”，又具有了形容国与国之间关系和睦的意义，“讲信修睦”一词的内涵也在经典阐释的过程中得到了不断扩展与丰富。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的交往中，就经常以讲信修睦作为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保持和平关系的原則方法。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宋真宗赵恒面对辽国太后萧绰与大臣韩德让相继去世，辽圣宗耶律隆绪立足未稳之际，没有选择通过扶植辽圣宗之弟耶律隆庆从而分化辽国政治，而是表示：“柔远之道，务存大体，正当讲信修睦，使之和协。如其不法，岂宜更加礼耶？”^[8]从而在大局上维持了两方的关系，也使得“澶渊之盟”以来的和平成果得以延续。然而当国家之间失去了平等相待的地位之后，所谓的讲信修睦便沦为了自欺欺人的话术。为打消金人北伐的疑虑，宋高宗在诏书里表示：“朕惟偃兵息民，帝王之盛德；讲信修睦，古今之大利；是以断自朕志，决讲和之策。”^[9]宋高宗在这里高谈大谈“讲信修睦”，实则是为自己的投降策略寻找一个合适的理由。

近代以来，随着工业文明与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与扩张，中国被强行纳入近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原有的以己为中心，建立在朝贡体系基础上的“天下观”，开始逐渐被资本主义全球化视野下的“世界观”所取代。这一时期，一些有识之士虽然对于列强的环伺与威胁有着清醒的认识，但是无奈于综合国力的巨大差距，只得以“讲信修睦”作为维持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表面和平的外交辞令。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1885年，清军取得谅山大捷。然而清廷却在此时与法国签订停战条约，对此彭玉麟上《严备战事疏》，指出侵略者狼子野心的同时，

也打破了清廷一直来讲信修睦的幻想：“西国覬觐中土多历年所，彼其用兵于我，忽而请款者。夫岂有爱于我而讲信修睦哉？其必有所图也，明矣。”^[10]在列强的威压之下，清政府最终还是选择了撤军，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在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面前，晚清的“讲信修睦”终究沦为了弱国艰难谋求生存的一厢情愿。可见，近代以来由于自身的落后，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地位本身就存在着极度的不平等，在此形势下对外倡导的“讲信修睦”往往成为一纸空文，难以实现。

前面提到，“讲信修睦”在诞生伊始即用以形容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并且蕴含着儒家践行礼治的重要思想，于是这一思想也随着之后官方意识形态对于礼治的尊崇与推广，从而与百姓的生活建立起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体现在援礼入法与援礼入俗两个方面：就援礼入法而言，《唐律疏议》开篇即列“十恶”罪行，其中八曰不睦，即指“谓谋杀及卖缌麻以上亲，殴告夫及大功以上尊长、小功尊属。”其中疏云：议曰：《礼》云：“讲信修睦。”《孝经》云：“民用和睦。”睦者，亲也。此条之内皆是亲族相犯，为九族不相协睦，故曰“不睦”^[11]。儒家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也由此具有了法律效力，亲族之间维持讲信修睦的和谐关系受到当时法律的保护。官员们更是将讲信修睦作为教化桑梓，维系乡里和谐的儒家义理，“讲信修睦”的处事原则也随着儒家学者与官员的倡导与支持逐渐影响到普通百姓的价值观念。就援礼入俗而言，是指最初“不下庶人”的礼逐渐融入普通百姓的生活当中。根据《礼运》之中的叙述：“故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讲信修睦而固人之肌肤之会、筋骸之束也。”^[12]其中的礼义又包含了“饮食、冠昏、丧祭、射御、朝聘”等具体内容，随着婚礼礼仪的开展，“讲信修睦”又成为婚礼娶亲场合下的用语。宋人丁升之辑录的《婚礼新编》，收录了大量当时娶亲所用到的启札范文，其中卷二《求亲》篇就收录了黄庭坚

的文章如下：“敬仰风流，惟是婚姻之故；讲修世睦，敢伸嫵婉之求。”^[13]黄庭坚以“讲修世睦”作为成就两姓之好的目的。在宋人黄晞《聱隅子》中亦言道：“冠仁服义，讲信修睦，以亲朋友，以和姻族，其自得也。”^[14]可见，到了这一时期，讲信修睦的概念已经逐渐从经典当中脱颖而出，开始与普通百姓的生活产生联系。

二、中国共产党对“讲信修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讲信修睦”的思想随着经典的传播与普及，逐渐被古代知识分子乃至普通民众所接受，且其内涵也在历史的发展以及经典的不断阐释过程中得到了极大拓展与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与精神命脉，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讲信修睦”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传之在当下的新时代依旧迸发勃勃生机，就要对其进行全面的解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注入相应的时代要素，从而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古为今用。前文已经为我们阐明了“讲信修睦”的经典出处与历史意蕴，不难看出，“讲信修睦”是儒家学者勾勒出的完美世界在大同之世中，人与人之间维持诚信与和睦的理想关系。可以说，大同之世既需要人与人之间的“讲信修睦”来作为其实现的必要条件；同时，“讲信修睦”也是大同之世人类关系的客观呈现。据此，我们可以从“讲信修睦”与大同之世的正反两方面，展现中国共产党对于“讲信修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一）建设国家公共秩序的文化依据

《礼记·礼运》指出，就人类而言，其同时具备了本能情感欲望的“七情”以及由道德理性引导下展现出的“十义”，而正是通过个人的道德理性驾驭本能的情感欲望，人与人之间讲信修睦的理想关系成为实现大同之世的必要条件。同时，这种理想状态的实现“舍礼何以治之？”

可见,“讲信修睦”的实现离不开礼治的践行。就中国古代的制度建设而言,滥觞于远古先民天地祭祀的礼产生的等级秩序,成为私有制在群体之中的表现形式,也标志着阶级社会的产生。在由部落首领所主持的祭祀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尊卑秩序最终得以确立,逐渐形成了在部落首领统治之下的带有阶级属性的组织架构。因此,中国的“礼”在形成之初就带有浓厚的阶级意味。先秦时期,随着儒家文化的出现与发展,相关的儒家代表人物都曾对由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的礼治有着相关具有创造性的论说。孔子首度提出了以仁释礼的思想,给原本外在强制性的礼赋予仁的内涵,从而走向内在的道德自觉。孟子与荀子则分别从内在的心性本体与外在制度规范两个方面发展了孔子的主张,也为儒家的礼治奠定了基础。而在以儒家思想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国古代,“礼法一体”成为中国传统法长时域历史进程中的一种常态^[15]。

综上所述,实现“讲信修睦”这一状态的关键就在于推行礼治。不难看出古代礼治具有两大特点:一是具有明确的身份等级性,二是具有道德伦理与法律规制的混一性。在此基础上,以现代的视角重新审视“礼治”这一古老命题可以发现,讲信修睦思想之于当下的一大重要意义在于它对于社会乃至国家公共秩序的强调与重视。当然,我们还需对传统“礼治”加以改造:在取消尊卑差异,提倡人人平等的同时,要进一步建立健全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与法律制度。由此可见,“讲信修睦”的传统思想为当下社会乃至国家公共秩序的建立提供了来自传统文化的依据,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制度自信背后深厚的文化自信。

(二) 成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

就大同之世而言,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公”,“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不仅是古代儒家知识分子勾勒出的完美社会图景,同时也是古今有识之士向往并为之奋斗的终极目标。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不断深入,工业文明虽然对

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与提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古代的完美社会图景并没有被人们所遗忘。从康有为编撰《大同书》提出建立“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理想社会,到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人类理想逐渐走出儒家经典,并与争取国家独立,民族复兴的救亡图存相联系。一代代仁人志士努力探索,为找到实现这一人类最高理想的道路而不断奋斗。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共产主义伟大理想与中国传统大同之世倡导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等价值观念高度契合。正是在这种契合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得以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并改造世界,在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同时,继续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大同之世的实现提供科学的方法与依据。

新时代,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为世界谋大同”成为新时代党的远大奋斗目标。这意味着在全球化时代,各国只有通过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等途径,才能实现世界大同的最高愿景,而诚信与和睦正是维系各国关系健康良性发展的必要条件。这无疑赋予了“讲信修睦”以新的时代内涵,其成为中国为全球发展提供的中国智慧、为世界文明贡献的中国力量。

三、新时代“讲信修睦”的价值指向

《礼记·礼运》篇中“讲信修睦”的中国智慧,旨在构建大同之世中人与人之间诚信、和睦的友好关系,随着经典的传播与普及,其受到了古代士人的向往与推崇,也被儒家官员运用于教化桑梓的地方治理当中。这也使得“讲信修睦”的传统观念并未局限于经典之中,最终“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普通百姓所能够接受的价值理念。至于将“讲信修睦”引申为国与国之间的和谐关系,进而运用于国家交往,纵观古代与

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与外交，我们不难发现，欲谋求与他国之间的讲信修睦，就必然要以两国之间拥有平等独立的地位为前提。新时代，“讲信修睦”的中国智慧也迎来了新的要求与指向。

首先，将成为培养高素质公民的道德要求。“讲信修睦”最初用来形容大同之世人与人之间的理想关系，涉及个人的道德践履。正如《礼记·礼运》中指出的，人既具有来自本能的情感欲望，又应具备不同社会身份所赋予的伦理道德，通过践行礼治，可实现待人以诚信、和睦。新时代，就是要求我们遵守并维护公共秩序。诚信与和睦，本来也是成就健全人格所必须的良好品质。当然，在具备诚信的优良品格的同时，与他人保持和睦友好的关系，是当前培养高素质公民的应有之义。

其次，将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借鉴。无论处于什么时代，人与人之间保持诚信与和睦的关系都是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的必要因素。因此，通过学校教育、社会宣传等方式，将“讲信修睦”的传统观念重新建立起来，有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同时，要求在充分尊重每一位公民独立人格与自由的基础上，遵守与维护当下社会的道德规范以及家庭伦理原则，从而使得这一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在当今社会生根发芽，并进一步发扬光大。

最后，将成为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思想助力。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一直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与世界各国谋求平等互利的外交关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世界影响力的持续扩大，我国的对外合作也随之日益加深。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讲信修睦”一再度回到人们的视野当中，并成为近

年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热门词汇。可见，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深深地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讲信修睦”也因此被赋予了时代意义。讲信修睦作为“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被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今后，应进一步挖掘并阐释“讲信修睦”的时代意义，传之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助力。

【参考文献】

- [1] [2] [4] [5] [12] 郑玄，注. 孔颖达，疏. 礼记正义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766—769，769，802，802，826.
- [3] 张岱年. 中国哲学大辞典 [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99.
- [6] 刘向，集录. 战国策 [M]. 鲍彪，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487.
- [7] 程颢，程颐. 二程集·河南程氏经说卷第四·春秋传 [M]. 北京：中华书局，1981：1097.
- [8]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三 [M]. 北京：中华书局，1995：1654.
- [9] 李心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M]. 北京：中华书局，1956：2827，2828.
- [10] 刘名誉. 越事备考 [M] //四库未收书辑刊·伍辑·柒册.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24.
- [11] 长孙无忌. 唐律疏议卷一·名例一 [M]. 北京：中华书局，1983：14.
- [13] 丁升之. 婚礼新编 [M].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2000：18.
- [14] 黄晞. 骈隅子卷二·大中篇第八 [M] //丛书集成初编. 北京：中华书局，1985：12.
- [15] 马小红. 礼与法：法的历史连接（修订本）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319.

责任编辑：张嘉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建构探析

张进蒙 闫海红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陕西行政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1)

摘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丰富、意蕴深远,具有鲜明的民族标识和历久弥新的价值魅力。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要求,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破解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难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建构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推进“两个结合”,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话语体系,实现其在全新时代背景下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

关键词: 文化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两个结合”

中图分类号: G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218 (2025) 02-0048-06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把文化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增强文化自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1]当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全面解读,充分认识其价值,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体系,探索具体的传承路径,对于增强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意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从时间历程和表现样态两个维度解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能够厘清其深刻内涵,更能把握其中蕴含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

(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要指在数千年的文化实践过程中形成和留存下来的文化瑰宝,并且至今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以及相对稳定的精神品格和价值取向。

第一,从时间历程上看,中华传统文化主要是指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前的中华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劳动实践创造的具有时代价值的中华文明结晶。中华传统文化在50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实现了与多元文化的融合碰撞,在确保其主体性地位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和接纳先进思想文化,丰盈人们的精神世界,构筑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话语体系。

第二,从表现样态来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收稿日期: 2025-01-15

作者简介: 张进蒙,男,中共陕西省委党校(陕西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闫海红,女,中共陕西省委党校(陕西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文化在新时代展现出的新样态。从 20 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针，结合中国实际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路线、策略，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使其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以引导革命事业不断取得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高度契合，凝练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的文化建设实践，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是新时代塑造文化自信的理论源泉。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独一无二的精神气质，为人类文明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从时间维度上分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价值，主要可以分为历史价值与现实价值。

第一，回望历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的自立自强、凝聚民族共识、实现民族复兴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滋养。在 5000 多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经历了无数的风霜雪雨，面对近代外敌的入侵和压迫，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出的强大精神力量才使得中华儿女戮力同心，团结起来反抗外来侵略，维护民族统一。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始终秉持高度自觉的文化担当，将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与中国每一阶段的实际国情相结合，实现了对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经验的总结，进而领导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第二，立足当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要素是涵养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源泉，并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习近平指出：“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3]中华文明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演进和政权更迭提供了思想指引，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深化和完善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

第三，展望未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应对挑战的深厚力量。当今世界国际文化环境激荡，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和文明博弈日益激烈，我们要在激烈的文化竞争中站稳脚跟，把握话语权，就必须坚定不移地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世纪呈现出崭新的生命形态。

二、何以必须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灵魂和精髓，赓续中华民族先进的文化传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题中之义，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对中华民族“尚学尚德”传统承续的生动体现，更是破解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难题的实践需要。

（一）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题中之义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不是简单的物理拼接，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并在相互成就的基础上造就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第一，从历史形态上看，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中华传统文化以其独特的时空连续性，始终保持绵延不断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而产生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不仅包涵着中华文明深厚的历史底蕴，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从鸦片战争的爆发，帝国主义列强入侵开始，中国被动卷入世界现代化大浪潮中。经过长期的艰难探索，我们成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突破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固有模式，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向世界展现了人类文明现代化发展的新图景。

第二，从社会形态上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

社会一路走来,在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存在快慢、水平高低的区别。中国共产党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索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共进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二)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在要求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把握好其源流脉络,这是新时代赋予我们独特的文化使命。

第一,从历史性讲,文明是在其自身发展轨道上通过不断积累生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植根于中华民族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精神根脉。中华文明是中华历史的产物,并在历史的延展和连续中得以发展。因此,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必须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古老文明的现代转型和中华文脉的绵延繁盛。

第二,从现实性看,实现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个时代性极强的命题。因此,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在不断深化拓展“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中,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深度挖掘两者间的契合点,推进两者的相互融通。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创的文明新形态,更是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形态,因此坚守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极端重要性。

(三) 承续“尚学尚德”中华传统的生动体现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对“尚学尚德”中华传统的生动体现。

第一,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尚学”的文化传统,强调通过不断学习来提升个人修养和道德素质。以儒释道传统文化思想等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早已走向世界,为解决全球发展难

题、破解人类生存困境提供了精神指引,至今仍熠熠生辉具有世界性价值和借鉴意义。

第二,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德”被视为人的立身之本,是评价一个人品质优劣的重要标准。“尚德”精神鼓舞人们注重道德修养,追求真善美,不断增强自身的道德感和责任感。只有善于传承,才能更加有效地创新,实现高效发展。新时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并以此为指导构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世界和价值归依。

第三,“尚学尚德”的中华传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对道德观念的塑造、个人素质的提升和社会和谐氛围的促进具有重要作用。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要基于新时代的时代特色,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尚学、尚德的精髓,进一步总结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思想成果,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呈现新的发展样态,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四) 破解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难题的实践需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话语形式,两者在相互促动中不断焕发旺盛蓬勃的生命力。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以物质资料充足、精神世界丰盈为特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财富积累越多,越需要中华文化的滋养,以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和风格独特,是中华民族自尊自信的文化根基,是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可或缺的力量源泉,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力量。

第二,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就要更好地担负起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职责使命,不断提升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新时代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当始终遵循“师古而不泥古”的重

要原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道德理念、价值追求、人文精神和行为方式等,经过时间的洗礼和岁月的淬炼,早已深入中华儿女的基因血脉中。但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传统社会土壤已发生翻天覆地的深刻变化,这就需要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表达方式,使之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

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原则和内容

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需要厘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原则和具体内容,只有明晰传承的原则和内容才能更加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一)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原则

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要求。只有把握好传承原则并以此为指导,才能厘清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内容,探索行之有效的传承路径。

第一,坚定文化自信。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新时代,文化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表现为对中华文化及其发展的坚定信心以及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和扬弃。文化自信作为国家和人民自信地看待自身文化发展前景,不断丰富和创新自身文化,进而推进自身文化发展的精神力量,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4]。坚定文化自信,要以精神的独立自主为原则,不盲从各种教条模式,也不照搬国外发展理论,始终坚持走自己的文化发展道路。

第二,秉持开放包容。世界文化因差异而出彩,推进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要坚持多元文化的共建之路。世界文化交往是跨国、跨地区、跨语言的交流,我们要尊重不同文化的独特价值,在不同文化互尊互信的基础上,推动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文明的多样化发展。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的博大气象,就得益于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开放的姿态、包容的胸怀。”^[5]面对当前多元的文化环境,我们

要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在坚持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精髓,实现外来文化为我所用,创造出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

第三,坚持守正创新。守正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守正不是守旧,要确保尊古而不复古的精神指引。守正是对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坚守,只有牢牢守住基本原则不动摇,才能保证前进方向不偏航。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更需要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只有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才能紧跟时代步伐和世界潮流。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不断提出文化建设和传承的新思路新话语新论断。

(二)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传承是多层次的,涉及多个领域的实践过程,包括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全面承续和发展创新。

第一,物质文化包括所有以物质形态留存下来的传统文化,春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并大多以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留存至今。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物质文化不仅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更有效增强我国各族人民的民族认同感。物质文化作为显性的文化载体,是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重要基础。物质文化通常又称为“有形文化”,是指历史上遗存至今的人类生产生活的物质成果。物质文化的传承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物化的经典文献、文化物品等形式的延续。

第二,精神文化主要包含价值观念、道德伦理理论、人文精神等意识形态文化,包括民本、诚信、大同的重要理念,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独特精神特质等。其中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力量源泉,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滋养。中国共产党

始终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新时期形成的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思想领域的最新文化成果和精神标识，是对中华文明基因的继承，彰显了中华民族文明创造的智慧和能力。

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构建的路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系建构是一项复杂而深刻的系统工程。文化承续视域下传统文化多元传播实践路径的探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构建的重要内容。

（一）挖掘思想价值，把握文化传承的精神之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蕴含的思想价值是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精神支撑。新时代，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价值，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魂脉之所在。

第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蕴深远，具有独特的思想价值。近现代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想，在传承过程中面临一定程度上思想断裂的困境。因此，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顺应时代发展的重要举措。

第二，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价值，实现其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以优秀典籍史册为基础，建立高质量文化数据库。对于承载优秀传统文化的不同载体，要有针对性地进行梳理和保存，并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数字化保存，守护中华民族既有的文明。

（二）培育践行主体，夯实文化传承的活力之源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需要依靠学校传承教育和民间传承的方式，培育践行主体，增进不同主体间协同合力。

第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新时代赋予每个中华儿女的使命，每个主体应自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传承体系的系统建设。学校

教育具有独特的育人功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学校教育中多呈现出系统、完整、稳定的特点。因此，必须把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融入国民教育体系之中，在学校教育中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日常的学习教育相融合，以传统文化涵育青年一代，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青年心中扎根。

第二，重视民间传承体系的建设。民间传承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民间传承也面临着一定发展困境^[6]。新时代，民间传承依然可以作为现代传承的补充形式，弥补现代传承追求高效和多元的发展所造成的传统缺失。

（三）创新传播方式，拓宽文化传承的传播之径

新时代，要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获得更好发展，构建传承体系，就要用全新形式，利用互联网平台广泛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借助网络传播的优势，依靠人工智能，实现传播途径的多元化和数字化，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播。

第一，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创新传播方式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至关重要。新时代面对世界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全新态势，要在坚持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舞台，向世界展示更多具有中国特色、蕴含中国智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方式的创新，是应对全球多元文化冲击的有效方式。可以利用互联网、社交媒体、虚拟现实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突破时空限制，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广泛传播到全球各地。

第二，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数字化。数字化传承技术在承续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显示出快捷、直观、生动的特点。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传统文化的数字化、智能化进程，使文化的传播形式发生了深

刻变革。在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过程中，要充分借助网络优势，依靠人工智能，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数字化，创造更加生动的文化传播形式，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人心。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3.
- [2]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M]. 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23-24.

[3]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 [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2.

[4] 王莹. 中华文化传播发展进程中的文化主体性、文化自信与文明互鉴 [J]. 理论月刊，2024（9）.

[5]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J]. 求是，2023（17）：4-11.

[6] 李红兵. 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研究的学术综述 [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5（4）.

责任编辑：黄晓翠

红色体育的传承、发展及其当代价值

张珂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陕西行政学院] 西安 710061)

摘要: 红色体育内蕴深厚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底蕴,内涵丰富、特色鲜明。其不仅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而且对军事技能训练、体育事业建设以及群众体育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当代传承红色体育的发展路径包括:融入教育体系、以赛事为媒、构建文化空间、利用纪念日以及融合红色旅游等,通过这些途径,可以有效传承和弘扬红色体育精神,促进体育事业的繁荣发展。

关键词: 红色体育 传承 发展

中图分类号: G8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218 (2025) 02-0057-04

一、红色体育的概念渊源与发展历程

(一) 红色体育概念的提出

红色体育这一概念深深镶嵌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之中。马克思曾言,色彩是民族性格的直观镜像,而“红色”与“黄色”肌肤,共同勾勒出中华民族的独特风貌,承载着丰富而独特的红色文化意蕴。自1864年“第一国际”诞生之日起,“红色”便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意蕴,成为革命与胜利的鲜明标志。“红色体育”是毛泽东在1934年苏维埃代表大会首次提出概念,也有部分学者称为“赤色体育”^[1]。在中国共产党的有力推动下,红色体育活动如同雨后春笋,在革命根据地与解放区迅速崭露头角,成为“革命根据地体育”与“老解放区体育”领域里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自党诞生至新中国成立,党一直引领并激励广大民众积极投身于体育活动

之中。在此背景下,井冈山、瑞金苏区、长征沿线及延安等地,红色体育活动蓬勃开展,蔚然成风。这些活动不仅着眼于提高军民的身体素质与丰富其娱乐生活,更将军事训练与体育活动紧密结合,充分彰显了红色体育的深远影响力。

(二) 红色体育的发展历程

红色体育这一融合了马克思主义等红色理念与体育精髓的独特产物,其萌芽可追溯至1917年,彼时毛泽东在《新青年》杂志上刊发《体育之研究》一文,其便已初露端倪^[2]。该文不仅对当时体育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犀利批判,而且以科学的洞察力剖析了体育的核心要义,为红色体育的初步形成提供了牢固的理论支撑。此后,红色体育便在中国革命的大潮中悄然兴起。在红色体育的兴起与蓬勃发展期(1921—1937年),中国正经历着土地革命战争的动荡岁月。在此期

收稿日期: 2025-01-15

基金项目: 2024年度校(院)青年基金项目(2024XJQNKT001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珂,女,中共陕西省委党校(陕西行政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传统体育文化与发展。

间,红色体育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激烈对抗中崛起。中央苏区作为红色体育的鲜明旗帜,极力推动体育理念与革命进程的和谐共鸣,秉持“以钢铁般的体魄,铸就工农阶级,击败所有敌对力量”的核心理念,苏区内的体育活动开展得热火朝天。此阶段,二十余项体育相关政策、批示、研究报告及大纲草案相继出台,红色体育的普及度和参与群体均实现了飞跃式增长,成为评判当时红色体育发展水平的关键指标。至1933年,体育俱乐部数量由前一年的700余个激增近三倍,达到1917个,参与者涉及红军战士、学生群体、共青团员及少先队员。

在1937至1949年间,红色体育达至成熟与鼎盛。这一历程中,延安及陕甘宁边区的红色体育尤为突出,它们在装备创新、运动模式、组织体系及思想理论上,相较于苏区时期,均展现出更为精进与全面的风貌。延安时期,红色体育步入崭新扩展阶段,毛泽东、朱德、贺龙等领导人给予其积极的支持与推动。毛泽东于“八一”集会中,号召全民投身运动,为抗战蓄力,并为“体育节”题写“锻炼身体,好打日本”;朱德在各根据地力推体育竞技,于“九一”运动会留下勉励之词;贺龙则在延安“九一”运动会上,倡言“体育运动军事化”,并创立“战斗篮球队”。这些行动合力将红色体育推向新的巅峰,其文化与精神也广布于解放区与各根据地。此时,体育锻炼与军事训练相融,学校体育秉承健身理念,体操、田径、球类、国术等项目迅猛发展。值得一提的是,“九一”扩大运动会作为红色体育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标志着红色体育正式步入成熟时期,具有深远的意义与影响。

二、红色体育的深层内涵与基本特征

(一) 深层内涵

首先,“以人为本”是红色体育的精神原点。红色体育,本质乃人之活动,深植人心,服务于众。它诞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专为革

命事业与民众服务,其精神核心为“以人为本”,强调全心全意服务大众。若忽略人的根本需求与特定时代背景,背离“以人为本”的精神原点,红色体育便将失其真谛。

其次,为革命事业服务是红色体育的一贯宗旨。在革命洪流中,红色体育始终与革命事业紧密相连。它不仅为人民群众提供了锻炼身体的机会,更成为革命事业发展的重要推手。从苏区到延安,红色体育在不同的阶段都展现出鲜明的服务特色。它像一面旗帜,引领着革命者勇往直前,为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再次,“艰苦奋斗,因地制宜,因陋就简”是红色体育的鲜明特质。“艰苦奋斗,因地制宜,因陋就简”这三大特质构成了红色体育的独特风貌。红色体育深受延安精神中艰苦奋斗品质的熏陶,其发展历程无不透露出这一精神的光辉。在苏区、长征、陕甘宁边区的艰苦岁月里,红色体育犹如顽强的生命,在困境中倔强生根,蓬勃发展。它向我们昭示:即便面临再严酷的环境,只要秉持先进理念的指引,便能从困境中汲取奋进的力量,持续前行。此外,红色体育还以其高度的适应性著称,能够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巧妙利用现有资源开展体育活动。这种勇于变通、敢于创新的精神风貌,不仅为红色体育开辟了广阔的发展天地,也为新中国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最后,“兼容并蓄、开拓创新”是红色体育发展的根本要求。所涉广泛,既发展现代体育,也促进民族传统体育。从苏区到陕甘宁,体育活动多种多样,包括西方竞技、学校体育、民族传统体育及改造后的民间体育。其中新秧歌运动作为典型,吸纳民间体育并去糟粕取精华,促进了体育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二) 基本特征

红色体育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其基本特征鲜明且深刻。

首先,红色体育具有显著的“革命性”,紧

密服务于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其方针政策、思想口号均体现出为革命服务的特点。从中央苏区的“锻炼体魄，消灭一切敌人”到抗战时期的“锻炼身体，好打日本”，再到新中国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红色体育始终与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紧密相连，服务于革命大业。

其次，红色体育着重凸显其“实践性”特征，植根于现实土壤，坚持根据当地条件、注重简朴实用的原则，以节俭的精神推动体育事业的发展。在革命战争艰苦卓绝的时期，红色体育虽面临挑战，却凭借民众的勇于实践与自力更生，成功开展多项体育活动，促进了其不断进步与发展。

再次，红色体育展现出“创造性”特征，不拘一格，对地域性的民间民俗体育进行革新，同时融合“土洋体育”文化，不断创新，为自身发展注入源源动力。这种创造性成为我党体育文化事业发展的精神源泉。

最后，红色体育内含“乐观性”特质，在苏区国民党严密封锁的重压下，在长征途中无尽艰难的挑战里，乃至陕甘宁边区重重围困的逆境中，其始终以一种乐观奋发、勇往直前的姿态，凸显坚不可摧的精神本质。

三、红色体育在当代的深远价值

（一）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当代典范

在当代社会，红色体育作为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典范，其深远价值不容忽视。这一独特的体育活动形式，不仅在学校中促进了师生间的深厚情谊，还全面提升了学生的体育素养。同时，群众体育通过修身养性，为民众的健康体魄提供了有力支撑，彰显了生命的无限价值。“红色体育”如同一股革命的有生力量，面对内忧外患、军事经济双重封锁的困境，不仅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更激发了军民参与体育的热情，蕴含着深厚的民族价值与生命力，成为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动力^[3]。

（二）红色体育对军事技能训练的现代启示意义

追溯往昔，“红色体育”在革命烽火中诞生，它如同一座熔炉，既锻炼了军民的体魄，又磨砺了他们的心志，是强化军事技能、提升作战能力的珍贵资源。如今，红色体育对军事技能训练依旧有着深远的现代启示意义^[4]。将红色体育融入军事训练是一场对官兵身心的革命性锻造，它如同烈火炼金，不仅锻造了官兵们钢筋铁骨般的体魄，更在心灵的土壤里播种下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种子。这种磨砺，与红色文化中流淌的英勇无惧、团结一心的血脉基因紧密相连，共同筑起军事训练坚不可摧的防线。同时，国防教育活动与红色体育文化的交融，不仅汲取先烈智慧，领悟红色精神精髓，更化为提升军事技能的催化剂，铸就国防实力的坚实后盾。因此，在当今的军事技能训练领域，我们亟须深入挖掘“红色体育”的丰富内涵，巧妙地将体育精神融入军事技能的培养之中，使官兵们在强身健体的同时，也能磨砺出坚韧不拔的意志，并引导他们在实践中传承和弘扬红色基因。

（三）体育事业建设的红色动力

“红色体育”这一独特的体育形态，根植于革命战争年代的沃土，由广大工农群众共同缔造，彰显了从实际出发、勇于创新的实践智慧。革命根据地的体育精神与组织模式，在历史的熔炉中熔铸成“红色体育”的精髓，它如血液般流淌在体育发展的脉络中，赋予体育顽强不息、因地制宜的生命力。当代，体育事业飞速发展，我们更应珍视并传承这份红色遗产。通过普及红色文化教育，激发社会各界对红色体育的热情参与，让红色基因在体育领域生生不息。同时，依托政策扶持与全民参与的双重优势，整合社会资源，为体育事业的繁荣兴盛筑牢根基。如此，方能让“红色体育”的精神之光继续照亮我国体育事业前行之路。

（四）推动群众体育建设

“红色体育”这一深植于广大民众之中的体育形态，不仅在革命岁月中激情涌动，更以其坚实的群众根基与深远的社会影响，搭建起党心民心紧密相连的坚固纽带^[5]。毛泽东“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宛如夜空中最亮的星，指引着群众体育事业在历史洪流中破浪扬帆，勇往直前。作为跨越时代的体育精神瑰宝，“红色体育”不仅熔铸了坚韧不拔、团结协作的“红色”血脉，还蕴含着丰富的体育智慧与宝贵的实践经验。在当下群众体育发展的宏伟规划中，“红色体育”如同一股清泉，为创新体育发展模式、激发民众参与热忱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让“红色体育”的精髓在新时代的群众体育建设中得以传承与发扬。

四、红色体育在当代的传承与发展路径

（一）融入教育体系，激活红色体育的校园生命力

红色体育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在校园中，通过将红色体育与军训活动相融合，我们不仅能够实现学生体质与运动技能的双重提升，还能深化学生对红色文化的理解与认同。军训中融入如“重走长征路”系列红色体育项目，如彝海结盟模拟、火线担架队体验、孤胆侦察兵挑战等，让学生在身体力行中感受革命先辈的艰辛与坚韧，实现学训一体化，让红色体育成为校园文化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二）以赛事为媒，拓宽红色体育的传播渠道

在当代红色体育的传承与发展进程中，赛事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极大地扩展了红色体育的传播范围。近年来，一系列红色主题体育赛事的成功举办，为红色体育注入了新鲜血液。以橘子洲红色半程马拉松为例，这项赛事将红色元素与体育竞技巧妙融合，不仅展示了高水平的竞技风采，更成为一场弘扬红色文化的盛会。自

2017年首办以来，每届赛事的奖牌设计都独具匠心，将红色元素与湖湘文化紧密结合，寓意深远。特别是2020年的奖牌，以五星为设计核心，彰显了“红色”马拉松的坚韧不拔，而背面刻有的毛泽东《沁园春·雪》中的经典诗句，则深刻展现了红色文化与体育精神的完美融合。同时，全国各地正蓬勃开展红色体育赛事活动，尤其革命老区举办的独具特色的红色体育竞赛，不仅承袭了红色体育的精神内核，还架起各地区体育交流的桥梁，促进了相互间的协作。这些丰富多元的比赛项目，为大众提供了亲身体验红色体育独特韵味的契机，也为红色体育的传承与发展铺设了新的道路。

（三）构建文化空间，打造红色体育的精神家园

文化空间的构建，是构筑红色体育精神殿堂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它为红色体育精神的弘扬与传承提供了坚实的实体平台。以西安·中国红色体育博物馆的成功落成为典范，其不仅开创了一片崭新天地，更专用于展现与深入探索红色体育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与此同时，众多革命老区也凭借其独一无二的自然风光与丰富的人文历史资源，将之巧妙转型为红色体育训练与户外探险的绝佳场地。这些场地不仅让参与者在亲身体验中深刻体会红色体育精神的真谛，更实现了他们身体与心灵的双重升华，进一步增强了红色体育精神的感染力与影响力。

（四）以纪念日为契机，强化红色体育的历史记忆

在重要的纪念日举办红色体育活动，是传承红色体育精神的有效途径。无论是土地革命时期的“五卅”综合性运动会，还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八一”抗战动员大会，都彰显了红色体育在革命年代的重要作用。当代，我们应继续利用纪念日这一标识，举办形式多样的红色体育活动，不仅使民众在亲身参与中铭记历史、传承文化，更让他们在切身体验中深刻领悟红色体育蕴

含的不屈意志与团结力量，进而点燃心中的爱国情怀，激发奋斗的决心。同时，这类活动如同新鲜血液，可为新时代的群众体育发展带来新动力，确保红色体育的精髓在当代得以延续并发扬光大。

（五）融合红色旅游，拓展红色体育的发展空间

红色体育与红色旅游的融合发展，为红色体育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南方革命老区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和优美的自然环境，为开展红色体育旅游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可将红色体育竞赛、文艺作品展演与乡村旅游相结合，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红色体育旅游品牌^[6]，如贵州的“红军四渡赤水”群众性水上体育活动项目，既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又让参与者在旅游中感受红色体育的独特魅力。

【参考文献】

- [1] 张玲玲, 张新, 刘青. 红色体育精神的生成逻辑、基本内涵与实践运用 [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23, 57 (11): 10-18.
- [2] 于思远, 顾帅, 毕金泽, 等. 传承与焕新: 红色体育文化的范畴锚定、发展嬗变、困境及其纾解 [J]. 体育学研究, 2023, 37 (5): 20-29.
- [3] 杨光兰, 孙丽艳, 龙小松, 等. 我国红色体育精神内涵、当代价值意蕴及实践进路 [J]. 体育师友, 2021, 44 (6): 39-42+49.
- [4] 薛宇. 红色体育精神的历史价值与当代启示 [J]. 延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3, 45 (5): 47-55.
- [5] 张宝强, 史进. 红色体育的时代价值与传承模式研究 [J]. 咸阳师范学院学报, 2023, 38 (5): 5-10.
- [6] 王硕, 张安琪, 匡小红, 等. 新时代我国红色体育文化传承及发展路径研究 [J].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21, 38 (5): 513-519.

责任编辑: 马文婷